

中国教会史

孙睿之牧师

目录

第一课	导论及景教来华	2
第二课	景教徒在华的生活和影响	3
第三课	景教和天主教在元代的发展	4
第四课	明代的天主教	6
第五课	明末清初的基督教	8
第六课	禁教后天主教在清代的发展及东正教来华	9
第七课	西方工业革命与19世纪对华宣教	10
第八课	19世纪西方宣教士来华情景:宣教与战争	12
第九课	19世纪天主教与新教在华发展情况	13
第十课	中外眼中的异端:太平天国(1850-1864年)	13
第十一课	宣教士调和福音与文化的努力	15
第十二课	晚清华人基督徒的状况	16
第十三课	晚清教案与反思	17
第十四课	百年大会与宗教自由请愿之争	18
第十五课	世界潮流与基督教	19
第十六课	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一):黄金时代	20
第十七课	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二):受挫	22
第十八课	20世纪初中国教会对时局的回应	24
第十九课	20世纪初中国教会内部的建造	25
第二十课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1937-1945年)	27
第二十一课	国共内战时期的教会(1946-1949年)	28
第二十二课	基督化家庭运动、小结与省思	29
第二十三课	以史为鉴看今日中国教会	31
第二十四课	中国教会的发展前景	31

第一课 导论及景教来华

一、导论

A. 教会史进路

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的得失。“中国教会”取广义，涵盖：

1. 隶属于东方教会的唐代景教和元代也里可温；
2. 天主教教会；
3. 东正教教会；
4. 新教教会。

B. 问题意识

英国历史学家吉尔伯特 (M. Gilbert, 1936-2015) 在《二十世纪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说：“每个历史学家几乎无一不将自己在某一特定时期形成的、建立在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反思的基础上的观点和看法，带入自己的研究之中。”思考：

1. 所传为何？福音纯正性问题—圣经汉译、教义阐释、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信仰言说。
2. 教会的建造历程—教会治理模式、中国基督徒的身分意识、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实践。
3. 中国处境中的教会—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与权力架构的关系。

二、时代划分

1. 中国古代教会 (7-18 世纪)—新教来华 (1807 年) 之前中国教会的兴衰起伏。
2. 中国近代教会 (1807-1949 年)—世界教会以宗教改革为重要分水岭；1807 年新教来华也可作为划时代的标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教会开始巨大转变，是为“中国近代教会”年份的下限。
3. 中国当代教会 (1949 年至今)。

三、书籍介绍

1.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2004。
王树声 (1881-1968)，字治心，浙江湖州人，1940 年出版《中国基督教史纲》，是第一部汉语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这位基督徒学者国学功力强，熟悉史料，护教立场清晰。但此书外文史料欠缺，取舍详略有不足，部份叙述不够精准。他另著有《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1933)。
2.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1988。

梁家麟 (1958-) 曾经是建道神学院院长。这本书浅显易读，结构合理，立论公允。

3. 赖德烈 (K. S. Latourette) 著。雷立柏等译。《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道风译丛 15。香港：道风书社，2009。

赖德烈 (1884-1968)，来华宣教士，耶鲁大学教授。这本书的初版年份是 1929 年，是经典巨著，资料详实，述及天主教、东正教、更正教在华的历史。

四、中国古代教会之福音来华

A. 多马传入说

1. 不少教父认为，在使徒保罗向西旅行宣教的同时，使徒多马也开始向东方传教。公元 50-52 年，多马先到印度的马德拉斯 (Madras) 附近传福音，随后沿西海岸到达马里伯 (Mariber)，取得丰硕成果。再后来他离开马里伯开始向中国旅行布道。约公元 68 年，多马返回印度，遭迫害殉道。照此传说，多马到中国传教应是东汉明帝年间 (公元 58-75 年)。
2. 历史学家多认为在 2 世纪末之前，基督教才传到印度西南的马里伯。当时有罗马商业船队从红海出发，经阿拉伯、锡兰等地到达马里伯，船上的基督徒商人把福音带到该地。

B. 景教来华

1. 史载福音正式来华资料—因着明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目前世界公认中国基督教史的开端是唐代。
2. 聂斯托留 (Nestorius, 386-451)—叙利亚人，出身安提阿教会，428 年出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就基督的神人二性及圣母问题，与亚历山太主教西利尔 (Cyril, 376-444) 发生争论。431 年，以弗所会议把他定为异端，聂斯托留遭流放。
3. 东方教会—聂斯托留和亚历山太主教西利尔的分歧，造成教会分裂。支持聂斯托留的教会于 498 年在叙利亚正式独立，全称“神圣使徒大公叙利亚东方教会” (The Holy Apostolic Catholic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简称东方亚述教会，从叙利亚发展到波斯、中亚、印度，并经丝绸之路于 7 世纪来到中国。
4. 阿罗本 (Alopen)—他是首位来华宣教士。唐太宗贞观九年 (635 年)，聂斯托留派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郊外，迎接阿罗本入城，可见阿罗本也许还肩负着外交和经济使命。唐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

第二课

景教徒在华的生活和影响

5. 获准在华传教—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诏书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唐会要》卷49）意思是认同基督信仰有助于治理国家，安抚百姓。639年，唐太宗准许景教在长安义宁坊建造教堂，称“波斯寺”或“波斯胡寺”。天宝四年（745年），因大秦即叙利亚，玄宗特颁诏改名“大秦寺”，用于安顿景教教士。

6. 布道策略：

a. 本色化—从景教的译经著述，就可以认识景教的布道策略。唐代儒释道三教鼎立，景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和生存，便极力适应，进行本色化。佛教东传之初（汉魏时期），西域和印度僧人来华宣讲教理，口口相传，使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思想方式予以比附解说，称为“配说”或“格义”法。例：以“五蕴”配“五行”。景教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扎根中国。

b. 用格义法例子—景教：“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关于“景”的意思，《尔雅》：“景，大也。”《说文解字》：“景，光也。”李之藻：“景者大也，照也，光明也。”由“景”字构成的词：景门（基督教）、景法（基督教真理）、景寺（教会）、景众（会众）、景力（大能）、景尊（神）、景风（圣灵）、景士（教士）、景日（礼拜天）……

7. 景教信仰言说评估：

a. 景教文献大致围绕着：

- ① 独一真神思想—《一神论》。
- ② 三一神论—《一神论》提及“父、子、净风”。集中于后期经典：碑文、《蒙度赞》、《尊经》。
- ③ 基督论—所有经典的中心神学。
- ④ 救赎论—早期经典《序经》、《一神论》，晚期经典《至本经》、《蒙度赞》。

这些文献的教导全面，符合基督教正统信仰。

b. 唐代景教的汉文经典尚处于相当草创的阶段。很多精致的神学细节尚待补足，才有办法将其观念建构完整。

c. 景教经典中每个新的专有名词，都需要一系列附带说明（系统神学的支持），才能找到恰如其分的定位。

一、景教的流传

唐高宗时，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在长安、洛阳、沙州、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此后两百多年间，景教基本上受到唐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保护，在中国取得很大发展，史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全国信徒多达20余万人。

二、景教的标志—十架莲花

十字架安置于莲台之上，左右饰以云纹。早在周代，莲花已是人喜爱的装饰图案。随着佛教1世纪来华，莲花作为佛国净土的象征，广泛出现在寺庙、石窟、造像、壁画等佛教装饰艺术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致鼎盛。

三、景教的组织架构

1. 监督。
2. 长老。
3. 执事。

四、景教教士的信仰实践

1. 一般教士的信仰实践—“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无拘”。他们会向东方，太阳出来之地的方向敬拜；会蓄胡须、剃头发、不蓄奴婢，不储财富，分给穷人；每7天做一次礼拜，重视敬拜祷告。“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办退修会）。
2. “白衣景士”伊斯的见证—景教徒向有“善医”的传统，伊斯更是“术高三代，艺博十全”，医术高超，“病者疗而起之”。“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能散禄赐”；“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

五、景教与唐王朝

1. 景教在中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唐王朝的政策。从贞观九年到会昌五年（845年）这两百多年间，虽可谓景教的全盛时期，但也非一帆风顺。

a. 武则天执政时期—武则天大肆佞佛，广造寺院，普渡僧尼，佛教地位跃居三教之首。圣历年间（698-699年），洛阳佛教徒对外来的景教发动猛烈抨击。

b. 玄宗先天年间（712年）—长安儒生主张华夷之辨，毁谤和耻笑景教。为此，东方教会派罗含和及烈两位教士前来重整教务。宋代《册府元龟》提到，及烈于开元二年（714年）伙同一些官员，

“广造奇器异巧以进”（赠送珍贵礼物）。

2. 会昌五年（845年），武宗尊崇道教，拆毁寺庙4,600余所，迫令26万余僧尼还俗，获良田数百万顷，得两税户15万人，史称“会昌灭佛”。景教被归入“邪法不可独存”，中国修士勒令还俗，送回原籍，外国人被驱逐出境。
3. 早在安史之乱爆发的755年，高仙芝率领的唐军被大食军击败。其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而唐朝国力也没落。景教转向西北的宁夏、甘肃、蒙古、新疆、中亚地区发展。

六、景教与蒙古各部

A. 景教与蒙古各部

1. 会昌灭佛，景教在华受到致命打击；乾符之乱，沿海教徒遭到屠杀，景教日趋式微。然而，在西北的绥远、宁夏、甘肃、蒙古、新疆和中亚广大区域，东方教会仍有可观势力。据东罗马史家记载，东方教会约于6世纪前后传入蒙古高原。那时，蒙古分为4个部落—克烈部、乃蛮部、篾儿乞部、汪古部。其中克烈部是最强大的蒙古部落。
2. 克烈部在11世纪初已经接受景教，先是首领，继而是20万部众。成吉思汗的义父王汗，是成吉思汗青年时代、东蒙古的头号人物。西方人视之为“亚洲基督徒君主长老约翰”。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及后来的征服战争中，克烈人分散于蒙古帝国各地，也把基督教信仰带到各地。
3. 王汗的3个侄女都是景教徒，各自在蒙古王朝的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
 - a. 长女亦巴哈，作了成吉思汗的妻子。
 - b. 次女别土出迷失，是成吉思汗长子朮赤的长妻。
 - c. 三女唆鲁忽帖尼，嫁给成吉思汗四子拖雷。这位母亲养育了3位他日登基作王的儿子，分别成为蒙古大汗、中国皇帝及波斯的伊儿汗（意即“居次位的大汗”）。

B. 蒙古帝国与东方教会

1. 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1206年，成立蒙古汗国，都和林，铁木真获“成吉思汗”尊号。他制定法典“也沙”（Yasa），首要律例为“所有人皆要信奉独一真神，天地的创造者”；并免除所有神职人员的税项，不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萨满教。
2. 13世纪上半叶，蒙古大军攻占了中亚、俄罗斯广大地区，最终攻入波兰、摩拉维亚、匈牙利和奥地利，从印度河直至第聂伯河、多瑙河，同时征服西夏、金、宋、高丽、缅甸、越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之后，蒙古汗廷周围有许多后妃、贵戚、将相、官员，均来自上述信仰景教的部落

和地区。

3. 蒙古帝国前4汗与基督教关系密切，对基督教采取宽容、友善、尊重的态度，有的汗王甚至倾向支持。13-14世纪，除了南部的印度次大陆，亚洲整个地区的基督教会，都在强大的蒙古统治者的治下。
4. 伊儿汗国—拖雷之子旭烈兀（1256-1265在位）于1258年占领巴格达，1260年攻陷大马士革，灭波斯阿拔斯王朝，建伊儿汗国。疆土与古波斯一样，由幼发拉底河延伸至奥克苏斯河以外，并由今日土耳其的安卡拉，外展至阿富汗的坎大哈。东方教会迎来蒙古的统治者，最初几位大汗对基督教都加以保护。直到旭烈兀的曾孙合赞汗（1295-1304）归信伊斯兰教之后，政策才有所改变。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席卷亚洲150多年，结束于奢侈腐败的生活、家族内斗和政治解体。波斯伊儿汗国经过6代后，于1335年覆亡。
5. “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元代恐怕是继唐代之后，对外最具开放心态的王朝。横跨欧亚的帝国版图，促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迁徙、融合与文化交流。

第三课

景教和天主教在元代的发展

一、景教（也里可温）在元代的发展

A. 13世纪东方教会中国境内大主教区

1. 喀什噶尔教区（现新疆）；
2. 唐兀教区（现甘肃）；
3. 秦（Sin）教区（现山西大同）；
4. 汗八里（元大都）教区（现北京）。大主教座堂设在元大都。

B. 蒙元治下的也里可温

1. “也里可温”的意思—源自希腊文“ἄρχων”（高贵的），经过波斯文“ärkäwün”、亚美尼亚语“arkhawun”，跨越整个中亚地区，进入蒙古大草原，被突厥游牧民族吸收，最终以音译的方式，以“也里可温”之名载入汉文史册。
2. 也里可温的特权—与皇室关系密切，受命为皇家祝寿、祈福，参与皇室祭祀。信徒不用服兵役、徭役，减免赋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于大都为也里可温设独立官署“崇福司”（后改为“崇福院”），统筹全国72所也里可温掌教司事务，拥有相当的宗教与族群自治权利。
3. 也里可温的兴盛—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由喀什以东直至北京，沿路随处都有景教信徒。该

教教堂遍布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有人统计当时在大都的景教徒大约有3万，加上西北、漠北约有10万。他们持守传统东方教会信仰。

4. 也里可温的特点—汉文化的渗透。从族谱、神道碑可知，元代基督徒基本上是家族性的，如汪古部就阿剌兀思氏、赵氏、马氏和耶律氏四大家族累世信教。定居中原地区之后，他们开始逐渐被汉文化渗透，改用汉姓，与汉族通婚，并学习和认同儒学。赵世延、马祖常虽出身基督徒世家，但都是元代著名文人，有深厚的儒学造诣。

C. 元代著名的信徒

1. 马薛里吉思—原籍撒马尔罕，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出任镇江府达鲁花赤，“常有志于推广教法”（《大兴国寺记》）。“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至顺镇江志》）于是辞官（1282年），改建自家为大兴国寺，又建甘泉寺、云山寺、聚明寺、丹徒县四渎寺、黄山高安寺。除镇江6寺外，还在杭州建大普兴寺。短短5年建起7座教堂，朝廷特“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大兴国寺记》）。
2. 爱薛东来—元代最具影响力、地位最显赫的景教士。他是弗林（叙利亚）人，被推荐到元廷，擅长天文、医学，深受定宗贵由汗、世祖忽必烈器重。出任崇福使，掌管基督教事务，为皇室信徒施行圣礼并讲道。
3. 拉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 1220-1294）—汪古部大都人，汪古部隐修士。汪古部东胜人（今内蒙托克托县）马可（Marcos, 1245-1317），拜扫马为师，受剪发礼为修士。1275年，两人决定去耶路撒冷朝圣，得忽必烈批准，但因战乱受阻于巴格达。1281年，马可继任东方教会主教长，成为雅巴拉哈三世，扫马任巡察总监（详见《马克和拉班·扫马西行记》）。

D. 元代基督教的消亡

1368年，明王朝定都南京，发檄文号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元顺帝北退，在华基督教也随之销声匿迹。考究消亡原因如下：

1. 对蒙古帝国的过度依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流于上层社会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信仰。民族隔阂与文化疏离，更使之依赖皇室与贵族的支持，缺乏民众基础。
3. 本土化程度低，至今未发现汉译经卷。被儒家看作邪教，并遭佛、道二教排挤。

4. 相对于元朝的对外开放，明太祖朱元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禁止一切外来宗教和人员进入。
5. 中亚突厥帖木儿（Timur, 1336-1405）伊斯兰教帝国崛起，先后征服波斯、花刺子模、印度和叙利亚。景教遭到致命打击，东西交通中断。

二、元代天主教

A. 初步沟通—罗马教廷遣使

蒙古人西征，使欧洲陷入恐慌。他们派人来沟通，好解除威胁。

1. 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 1195-1254）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或译“普兰·迦尔宾”，J. P. Carpin, 1182-1252）出使蒙古，觐见贵由汗。
2. 1253年，法国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 1220-1293）奉法兰西王路易九世（Louis IX, 1214-1270）之命，觐见蒙哥汗，希望允许传教被拒。

B. 元朝的盛情邀请

1. 约在1265年夏，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波罗（Niccolò Polo, 1230-1294），在上都和林朝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经商议，忽必烈遣使同波罗去罗马觐见教皇，请教皇选派100名既通晓信仰教义，又熟悉七艺（指西方的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音乐和地理）的学者来华。
2. 1271年，波罗带15岁的儿子马可（Marco Polo, 1254-1324），同教皇派遣的两位博学的道明会（或译“多明我会”）修士前往中国。两位修士因故半途而返，波罗父子叔侄3人历时3年半，终于在1275年夏天到达上都（北京）。

C. 天主教首位来华传教士—孟高维诺

1. 所有使者带回来的消息都表明，蒙古帝国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而且蒙古统治者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采取宽容态度。
2. 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 1227-1292）派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在亚美尼亚和波斯传教的孟高维诺（G. Montecorvino, 1247-1328）前往中国。1294年，孟高维诺抵达大都，获元成宗准许传教。
3. 孟高维诺传教的成绩斐然：
 - a. 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改宗，其部众也随之改信天主教。
 - b. 那时，大都侍卫亲军中来自高加索约3万阿兰人，收养150名7-11岁不等的儿童，施洗并教导希腊文和拉丁文，组成诗班。
 - c. 1298年，建成大都第一所天主教堂；1305年，

第四课 明代的天主教

于大汗宫门前一街之隔，再建一座可容 200 人的教堂。

- d. 截止 1305 年，受洗者达 6,000 余人，并翻译新约和《圣咏集》（诗篇）为蒙古文。
 - e. 1307 年，教廷设汗八里大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大主教，统辖中国及远东教务；同时增派 7 名方济各会修士来华协助，但只有 3 人最终抵达。
 - f. 1313 年，在刺桐（泉州）设主教区，由当地一亚美尼亚富有妇人出资修建主教座堂。
4. 1328 年，孟高维诺在大都去世，享年 81 岁，在华传教共 34 年，天主教信徒约至 10 万。

D. 元王朝宽容的宗教政策

1. 信仰自由—蒙古帝国采取的是诸教并蓄、来者不拒、信仰自由的政策。泉州主教 1326 年致书教廷：“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
2. 恩宠有加—“大可汗待遇国中基督教徒之服从罗马教堂者，恩眷至为隆渥。资助一切所需，其为皇帝所轸念爱护可知也。教徒有请求皇帝供给教堂十字架圣殿，以祀耶稣基督者，皇帝无不欣然许诺。惟帝亦转求代为祈祷天主，祝使圣躬康健，尤以说教时，须代为之。皇帝允许并鼓励基督教士往信异教之浮屠寺中，说天主教大道，又使信异教者往听基督教士之说道。信异教者亦皆乐往，常表示虔信之诚心，解囊施舍以助。基督教徒有需救助者，皇帝陛下即遣其臣仆急周济之。”（约翰·科拉：《大可汗国记》）
3. 国家津贴—泉州主教 1326 年致书教廷：“既抵汗八里，传教皇谕旨，拜总主教后，居其处几五年之久。于此时间，尝自皇帝取得阿拉发〔Alafa，阿拉伯语〕一份，俾可供给吾等衣食之用。阿拉发者，皇帝所赐外国使臣、说客、战士、百工、伶人、术士、贫民以及诸色人等之俸金，供其生活费用也。所有俸金之总数，过于拉丁数国王之赋税。”
4. 余绪及湮灭—1333 年，即孟高维诺去世 5 年后，罗马教廷才闻讯，派出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继任汗八里大主教，但中途不知去向。1336 年，元顺帝派遣 16 人使节团觐见教皇，请求派人继任大主教职。1342 年，教皇特使意大利方济各修士马黎诺里（Marignolli, 1290-1360）一行抵达大都，受到欢迎，在大都三四年后返回。此后，罗马教廷虽曾 3 次委任中国大主教，均未能到任。天主教在华传播陷于停顿。1362 年，泉州陷落，泉州主教詹姆斯被杀，天主教失去基础。

一、时代背景

A. 明朝的内忧外患

明英宗 8 岁即位（1435 年），明帝国开始步入衰落期，四处是逃避徭役的流民、自然灾害、民间动乱，加上宦官干政、官吏贪腐、厂卫维稳。弘治年间（1488-1505 年），北方蒙古的威胁日益严峻；嘉靖朝（1522-1566 年）有东南沿海的倭寇；万历朝（1573-1619 年）女真族兴起。这一切都让明朝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B. 欧洲的地理大发现

14、15 世纪，通过小亚细亚到东方的贸易商路，被突厥人的势力阻隔，欧洲沿海城市的商业受到极大损失，促使他们寻找到东方去的海路。这引发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极大意义的地理大发现：

1. 1487 年，葡萄牙人迪亚士（B. Dias, 1450-1500）发现好望角；
2. 1492 年，西班牙人哥伦布（C. Columbus, 1451-1506）发现美洲；
3. 1498 年，葡萄牙人达迦马（V. da Gama, 1460-1524）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
4. 1519-1521 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 Magellan, 1480-1521）首次环绕地球，发现吕宋。

16 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世界最早的殖民国家；在 1500-1815 年间，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是欧洲的扩张和欧洲文明向全球的传播。

C. 耶稣会成立

1517 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作为回应，天主教在 1534 年成立耶稣会，热心对外宣教。其中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到东方地区传教。他说在日本对面的中国，拥有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问深奥的博学家：“仅就我得以了解的情况而言，教育和学习在那里很受尊崇，在学术中最突出者占据首位并拥有权威……因此，新来的传道人还应该有一种智慧并掌握一种很突出的科学，以便能够机智而又正确地回答无数的问题……他们尤其首先需要精通哲学，特别是精通辩证法，以便能够说服和击败那些思想家们……我希望这些教友们不会对天文学一窍不通。”

二、澳门—远东的宣教中心

1. 1517 年，葡萄牙人来广东贸易，要求通商。

2. 1535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为通商根据地。
3. 1557年，中国正式允许葡人在澳门居住。
4. 1574年，一道界墙建立，葡人在其中自治。
5. 不久，贸易地点北移至广州。1578年，葡人获许一年一次（后增至两次）到广州贸易。
6. 自1557年开始，葡人在澳门定居者日益增多。教廷设立澳门教区，各修会纷纷到澳门建造修院，澳门成为面向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宣教基地。
7. 1578年，范礼安（A. Valignan, 1538-1606）到澳门巡视教务，提出尽量了解中国的礼俗、社会和民情，并委派传教士到中国居住，学习中文。

三、明代首位获得旅居权的传教士

1. 1579年，范礼安调派罗明坚（M. Ruggieri, 1543-1607）至澳门，学习中文，准备进入中国宣教。1582年，应两广总督邀请，罗明坚和另一个修士入住肇庆东关天宁寺。
2. 在来访的文武官员眼中，他们是佛教僧侣，而他们也错就错地剃发、穿僧服。他们提倡文雅和巧妙：“在开始的阶段，必须非常文质彬彬地与这个民族交往，不能以不谨慎的狂热行事。”

四、利玛窦

1. 1582年，罗明坚通过范礼安，把他在罗马认识的朋友利玛窦（M. Ricci, 1552-1610）召至澳门。利玛窦在1571年加入耶稣会，次年入罗马学院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透视学、修辞学、哲学，并学习天文仪器、钟表等技术。
2. 利玛窦在澳门学习中文一年，1583年随罗明坚至肇庆，建教堂名“仙花寺”。客厅悬挂肇庆知府题的“西来净土”。一位年轻慕道友建议把“God”（神）译作“天主”，并书写在一块木牌上。
3. 从西僧到西儒—有个儒生告诉利玛窦，在中国社会，儒生才是最受人尊敬的，因此建议他穿儒服，留须蓄发，改称“西儒”，以提高社会地位。利玛窦欣然接受，开始精研儒家典籍。这成为他在中国宣教活动的转捩点。
4. 易佛补儒—“在本人撰写的著作中，我始终都对他们〔儒生〕的赞扬开始，以便能使我利用他们挫败其他人〔佛教徒和道教徒〕，而又不直接驳斥他们，仅仅是诠释他们与我们的教义相违背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要同时反对三教，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就太多了。”（1609年2月15日书简）。利用儒家的前提，是因为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是被“自然理智之光”照亮过的。利玛窦看到儒家主张崇高的道德教导，但并没有宣扬来生，也缺乏教义系统结构。这对基督教来说是最好不过的机缘，因为基督教有能力填补这个空

缺，补充早期儒家的学说。

5. 找到交汇点—在1603年出版的《天主实义》中，利玛窦试图表明古代中国人已信奉造物主—天主。早期儒家的“神”信念是正确的。他也肯定中文的“天”不是没有位格或物质性的。“神”和“天”这两个术语，都正确表达了基督教的“天主”这个概念。他从中国典籍中引证出现过“神”字的11段文字，认为由此找到了逐渐把中国人引向基督教的一个途径。
6. 重新发现孔子—“把文人宗派的主要人物孔夫子吸引到我们一方来，即按照有利于我们的观点来诠释他遗留下的某些令人争论不休的著作。”利玛窦反对后期儒家的注疏，对早期儒家重新解释和认识。利玛窦认为，重新发现孔子的原初教导，将给予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一个可接受的位置。
7. 宣教策略—与文人阶层相结合，以欧洲科学影响他们，并由此在他们中间获得来中国传播真正神教义的人必不可缺的权威；学习他们的知识传统，以便根据这些知识，分辨是否与基督教的真理符合，然后决定利用或反对之。利玛窦的全部策略，实际上建立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格言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神”与“天主”之间的类比关系上。
8. 利玛窦在1598和1601年两次进京，并获准定居北京。1605年，他在徐光启的帮助下，在宣武门内建教堂—南堂。罗明坚：“全部事项都取决于皇帝是否有意和渴望把神父们召到其身边”。利玛窦：“当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基督徒时，就会有可能向皇帝呈奏一道本章。由于皇帝的干预，至少可以获得允许基督徒根据其教法生活。”
9. 1610年，利玛窦去世，享年57岁，御赐墓地，葬于阜城门外二里沟。

五、传教士的译经和早期著述

- 耶稣会并不急于翻译圣经，他们在中国的文字事工主要是撰写教理类和基督生平类著作，例：《十诫》和《基督耶稣生平》。由于教廷还没有批准让圣经广泛和自由地流播于民间，当时的天主教教士没有致力于翻译中文圣经，多撰写圣经要义，以及按弥撒书、祈祷书的形式编译。20世纪才出版的《思高译本》，是天主教修士在中国翻译完成的第一部新旧约圣经，也是唯一的一部。他们翻译的，多是：
1. 护教类著作—例：利玛窦《辩学遗牍》。此书于1609年刻于北京，讨论佛教和天主教的异同，驳斥佛教的学说和神哲类著作。
 2. 神哲类著作—例：西班牙来华耶稣会士庞迪我（D. Pantoja, 1571-1616）的《七克》7卷。此书1614年在北京初版，推论以七德克七罪：以

谦伏傲，以仁平嫉，以施解贪，以忍息忿，以淡塞饕，以贞防淫，以勤策怠。

3. 教史类著作一例：艾儒略 (G. Aleni, 1582-1649) 著，1620 年北京刻的《利玛窦行实》，记载利玛窦一生行迹。
4. 历算类、科学类一例：《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利玛窦 1602 年绘制的《坤輿万国全图》。

六、总结

A. 主要的思想挣扎

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诗“两头蛇”，就写出了明代信徒的挣扎，表达第一代天主教徒的精神痛苦——又想向东，又想向西。总结中国天主教徒的思想挣扎，主要在以下两方面：

1. 祭祖与祀孔；
2. 纳妾与殉国。

B. 辨异与冲突

17 世纪中叶，传教士被发现只不过是一些冒牌的儒教徒，赋予中国经典引文完全不同的意义和解释。他们的意图，实际上是歪曲中国的传统，从内部改造之。利玛窦为了避重就轻，在《天主实义》中仅有一处简单提到耶稣。当遇到耶稣时，中国文人很难理解和接受。例：有位福建泉州的文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认为传教士是一些从事历书和天文仪器工作的学者，因而和他们保持交往；但一旦获悉传教士以汉哀帝时的罪犯耶稣为天主时，他的观点就完全改变了。

第五课 明末清初的基督教

一、文化顺应策略受挑战

1. 龙华民 (Ni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 是利玛窦指定的接班人，却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策略有不同看法。他接任中国耶稣会会长后，主张废除“天”、“神”、“天主”等译名，改用拉丁文音译“陡斯”。史称“译名之争”。
2. 1623 年，龙华民写成《孔子及其教理》，指出借用中国经典文献并赋予一种新的诠释的危险性，并指出文人信徒事实上是多么不重视教理，因为在他们眼中一切都可以调和。

二、南京教案

1. 从 1582 年罗明坚第一次到肇庆，至 1616 年发生南京教案的 34 年间，共发生多达 54 起教案。

2. 南京教案的发难者是南京礼部侍郎署礼部尚书的沈催。他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之禁为根据，力主排斥天主教。理据：
 - a. 西方教士散处中国，时有窥伺之嫌；
 - b. 劝人但奉天主，不可祭祀祖宗，是教人不孝；
 - c. 私习历法，有背律例私习天文之禁，恐创为邪说，混乱听闻；
 - d. 西教擦圣油、洒圣水，聚男女于一室，易败风俗、乱纲纪；
 - e. 传教士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其财路不明。
3. 幸好还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云等官员勇敢辩护，最后事件才得以解决。

三、南明朝廷中的教徒

1. 1644 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在煤山上吊，明朝覆亡。
2. 1646 年在肇庆建立的永历小朝廷，是南明最后一个政权。
3. 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皇后、皇太子都受洗入教，宫中领洗者有 50 人。永历帝本人也曾参与弥撒，朝中重臣瞿式耜（瞿太素之侄）、太监庞天寿都是天主教徒。
4. 太后曾遣使到澳门献祭，并派传教士卜弥格 (M. Boym, 1612-1659) 给教宗和耶稣会总会长送信，请求多派耶稣会神父来中国传教。
5. 永历小朝廷最后被吴三桂所灭，永历帝也被赶到缅甸，在那里被害 (1662 年)。

四、清代天主教

A. 通玄教师汤若望

1. 1644 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传教士成为皇室宠儿，因为他们上通天文，又懂得制造大炮。
2. 1645 年，清王朝启用新历“时宪历”，耶稣会修士汤若望 (J. A.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出任钦天监监正。
3. 顺治年间 (1644-1661)，天主教在华宣教取得巨大成果。信徒人数从清初的 15 万，增长至将近 26 万，平均每年增加 7,500 人，是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华发展最快的时期。

B. 历法之争

1661 年，顺治去世，年仅 8 岁的玄烨即位，整拜专权。杨光先攻击传教士图谋颠覆清朝，儒家、佛家等仇视天主教的人也群起附和。1664 年，北京及各省传教士纷纷被捕。1668 年，历法大比拼，传教士获胜，杨光先被革职。次年，康熙亲政，汤若望获得平反，南怀仁 (F. Verbiest, 1623-1688) 出任钦天监正。

C. 礼仪之争与禁教

1. 礼仪之争是历时近百年、逐步升级的争论，从17世纪30年代，到18世纪初，历时近100年。一开始，是耶稣会内部的张力，后来发展到耶稣会和其他修会的争执，再发展到教廷和清朝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层层递升。

2. 福建大爆发：

a. 主持福建教务的耶稣会士艾儒略(G. Aleni, 1582-1649)，全面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路线，被当地教内外绅民誉为“西来孔子”。艾儒略对中国文化采取十分开明的态度，包括允许天主教徒进祠堂、入孔庙。

b. 1633年，方济各会士李安堂(或译“利安当”，A. C. Santa Maria, 1602-1669)到达福建，对耶稣会神父的做法大感震惊，便联合道明会(或译“多明我会”)反对耶稣会的做法。其中主要争论问题：

- ① 中国人在祭奠先人时，为什么要把3杯酒中的第一杯酒在地上？
 - ② 为什么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在天上、地下和牌位之间来来去去？
 - ③ 为什么中国人要跪拜牌位？
- 耶稣会看这些是文化问题，但其他修会修士就认为当中涉及偶像崇拜。

c. 1643年，道明会会士黎玉范(J. B. Morales, 1597-1664)向教廷传信部提问：

- ① 是否允许中国信徒向社会祭神典礼捐献财物？
- ② 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政府举行的祭典？
- ③ 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孔典礼及丧葬祭拜之仪？
- ④ 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拜祖先牌位的典礼及举行其他祀祖仪式？

d. 总结争议，关键问题有两个：

- ① 按天主教教义来看，在中国士大夫和民间流行的“祭孔祀天”礼仪，是否属于异教？
- ② 教会能否对已经归信天主教，并参加教堂生活的中国教徒的祭祖习惯，加以容忍？

3. 教廷态度的演变：

- a. 1645年，教廷通谕禁止信徒参加祭祖祀孔。
- b. 1656年，新任教皇却准许按耶稣会旧法去做。1659年罗马传信部的指示：“不要试图去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风俗、思维方式，因为这些并不公开地反对宗教和良善的道德。还有比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到中国去更傻的事情吗？不是要出口这些欧洲国家，而是要出口这信仰。这信仰并不和任何种族的礼仪习俗相矛盾冲突。”

4. 康熙介入及百年禁教：

a. 1700年11月30日，康熙帝正式介入礼仪之争。当日在京耶稣会士徐日升、张诚等上书，得到皇帝支持。

b. 1705年底，教皇特使抵达北京。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

c. 1715年，教皇再次发布严厉的禁令《自登基之日》，不容天主教徒祭祖祀孔。

d. 康熙读《自登基之日》后朱批：“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此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5. 翻案：

a. 1932年，日本上智大学发现1258年教廷允许教徒参加非基督教仪式的通谕，最终教廷通告允许日本教徒可以在神社中低头行礼。

b. 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 1876-1958)颁布《众所周知》：“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

第六课 禁教后天主教在清代的发展 及东正教来华

一、禁教下的天主教会

A. 地下教会

雍正、乾隆两朝对天主教的查禁都甚严厉。天主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但从未中断。“令人感到惊奇的，不是基督教遭受迫害的事实，而是它居然还能够存在下来。”(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

B. 网开一面

1. 按清王朝法律规定，凡抓到基督徒，都要给他们选择的机会。所有表示后悔，愿意出教者，都可以当堂释放；只是必须当众从十字架上踩跨过去，并立下“改悔甘结”(即保证书)。那些坚持信仰的，就会被发遣到新疆为奴。

2. 从清朝现存档案来看，一个地区破获天主教聚会，约90%的被捕者会选择踏过十字架回家，只有10%的信徒坚不退教，被发往新疆为奴。然而，在前者之中，有些人时隔几年再被捕，便宁死也

不出教了。

3. 清朝这做法，是仿效日本江户时代的“踏み绘”。

C. 神父刘以相

陕西城固县自康熙年间（1662-1722年），就有西方传教士来传教。该县刘以相，教名刘西满，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前往西洋学习神学（7、8岁）。20年后回到家乡作神父；11年后（1784年）被抓流放；22年后获释回乡，继续作神父达10年；年逾70再度被捕，被永远枷号示众。

D. 当信仰进入家庭—清代天主教的社会嵌入

1. 宗室苏努一家：

a. 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四世孙，康熙朝曾任镶红旗都统、奉天将军等。他有子13人，可考者有9人为天主教徒。

b. 1724年，77岁的苏努被革去“贝勒”，同诸子发配充军，次年在戍所去世。

c. 1726年圣诞节前夕，苏努三子苏尔金被捕，十子书尔陈、十一子库尔臣立即公开站出来宣告自己的信仰。库尔臣4名8-14岁的幼子找到官员，表示情愿把自己的名字列入信主者名册。

d. 1805年，距苏努案发81年，清廷再次发现苏努的曾孙图钦、图敏仍在信教，被判发配伊犁，到配枷号6个月后充当苦役。

e. 33年后（1838年），官方查明苏努后代仍在信奉天主教。两年后，发现当时表示放弃信仰的家族成员，还在家中挂像、读经。为了根除“举家世习天主教”的家族，特将其迁往伊犁。苏努一家前后5代信教，时间跨度百余年。

2. 清朝档案可以见到许多被捕教徒供称，“祖上原奉天主教”、“祖传天主教”，可见天主教已成功嵌入中国社会。

二、东正教来华

A. 东正教来华

东正教是东西方教会分裂后形成的一大传统，流传的区域是东欧、西欧、俄罗斯、希腊。东正教首次来华是在元代（13世纪）。蒙古人曾先后48次进攻俄罗斯，俘虏了数千俄国人，分散在福建、广东、四川。14世纪之后，这些最早来华的东正教徒便“消失在异教荆棘丛生的遥远东方”。

B. 清代俄罗斯战俘

中国最早的东正教信徒是达斡尔人。1681-1685年，康熙派清军对俄作战，俘近百名俄人，叫“阿尔巴津”人。清朝把他们安置在北京，编入镶黄旗。当时有司祭马克西姆·列昂节夫，康熙赐他七品

官衔，把官地寺拨给他们作暂时的祷告所。这就是后来在东直门内的圣索菲亚教堂。康熙致司祭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你被俘虏，这对神圣的事业是有利的，因为基督的正教信仰要依靠你们来加以传播”。

C. 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4月，第一届“俄罗斯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抵达北京。工作内容除宗教之外，还包括“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1715-1955年的240年间，共有20届布道团派驻北京。在1781-1842年，成为东正教徒的华人只有55名。

第七课

西方工业革命与19世纪对华宣教

一、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变革

A. 西方世界的时代气氛，推动拓荒宣教

工业革命的成功，塑造了19世纪积极乐观、极富创造性的精神。在整个19世纪期间，文艺复兴释放出来的西方文明思想，创造了新的社会和政治改造事业，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极大变化。

B. 交通网路改善，对宣教带来帮助

由于木材枯竭，英国基于工业需要，开始寻找煤。后来，又由煤产生出蒸气机、抽水机、发动机、蒸汽火车头等。在19世纪，铁路网遍布整个欧洲，加上螺旋桨轮船的使用、海运迅速发展等，带来交通大改进，促进了宣教发展。

C. 电力应用对宣教带来帮助

电力应用在电灯、动力输送、电报通讯上。电报系统普及，使消息可在世界各地同时播报，这些新科技也促进了宣教发展。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

1. 冶金、农业科学、化学等新技术出现，新的钢铁材料出现，致使可建大型建筑。新科技可使同一面积资源耕地，养活更多人口，得更多收获。医学进步，使人的平均寿命增长，工作效率增加。这些变化也带来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巨大调整。

2. 19世纪历史的核心，在于推动和促进5项建设：

a. 获得及使用财富；

- b. 货币体系；
- c. 政府管理和集体经营；
- d. 世界政治秩序；
- e. 遍及全球的教育制度。

三、地理与世界局势

A. 新大陆的发现

美洲大陆的发现，赤道以南、非洲的发现，东方海洋诸岛屿的发现，使西方人的世界突然增加了4倍！他们想像，只要他们去占有并经营这些土地，欧洲由于拥挤而带来的贫困就会消失。于是，欧洲列强开始对那些新疆土，提出了疯狂而贪婪的“要求”，立即忙于在美洲、非洲、澳洲和亚洲树桩标界，占领土地。

B. 殖民地掠夺

在土地上的传统项目有：黄金、香料、象牙、奴隶。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欧洲人口的增长，促使列强政府向海外寻求各种食物；同时，工业革命的发展，造成对油脂、橡胶等原材料的需求大增。

C. 被瓜分的非洲

19世纪中期，欧洲人只在非洲沿海地区建立殖民地；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非洲已被列强测绘、探查、评估和瓜分了。非洲大陆在怒骂和争夺中，被分割成一块块；也就是说，非洲在四分一个世纪里，就已经被瓜分完毕了。有历史家说：“在这件事上，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双手是完全干净的。”

D. 日不落帝国

19世纪的英国，成为全球拥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被喻为“日不落帝国”。

E. 思想盲点

从大量19世纪的文献可知，当时的欧洲人普遍认为，欧洲人在世界上将永远占有优势，对人类拥有永久的领导权，并坚信全世界落入欧洲人的统治之下，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他们对于什么构成一种持久的政治制度，几乎毫无所知，也没有深入批判、反省的习惯。

四、新教的宣教运动及其时代特色

1. 在18世纪，莫拉维亚弟兄会是新教中最先认真地遵行基督大使命的教会，差遣人到非洲、亚洲、格陵兰、印第安等地传福音。
2. 19世纪成为新教展开普世宣教运动的大时代，各种差会成立，可惜都带着“特别的”自信。

3. 宣教事工促进被宣教地区的社会文明，率先兴办民间服务机构—学校、医院等，同时也帮助新兴国家建立政治基础。然而，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不免给当地文化造成巨大冲击，甚至促使当地文化习俗全面解体。

五、19世纪新教宣教士的眼镜

A. 他们的前设

1. 基督教可以带来理想社会—19世纪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使他们建立了非常乐观的态度，以欧洲社会的成就为理想社会的蓝本。
2. 以是否接受福音，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的指标—他们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道德水准、物质文化，都高于异教国家。基于这些想法，他们在宣教的同时，对某些民族和国家，在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诸多改造。

B. 反省

宣教士对西方文化、文明的看法，与基督教所提及的福音、和平、饶恕、爱等等，有多大关连呢？宣教，到底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六、新教宣教士初来中国

A. 马礼逊

1807年，马礼逊(R. Morrison, 1782-1834)来华。当时的使命是：

1. 把圣经翻译成中文(1823年出版了《神天圣书》，共21册)；
2. 编中英字典；
3. 领中国人归主。

B. 中西彼此的想像

1. 西方人看中国：
 - a. 利玛窦来中国时，对中国持神秘、尊重的看法，甚至有西方哲学家对中国推崇备至。
 - b. 到了殖民时期，西方宣教士看中国是“愚昧化”了。看中国为“黄祸”，对中国有负面的想像和回忆。首次负面回忆，源自匈奴攻打罗马帝国；第二次恐怖回忆，来自13世纪蒙古人西征。
- c. 19世纪小说家洛莫尔(S. Rohmer, 1883-1959)撰写系列小说，创造了“傅满洲博士”这样一个小说人物(1875年)，塑造了“黄祸”的形象：“你可以想像一个人，瘦高，耸肩，像猫一样地不声不响，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壳，细长眼，闪着绿光。他集所有东方人的阴谋诡计于一身，并且将它们运用发挥得炉火纯青。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想

像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你的头脑里就会出现傅满洲博士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的形象。”

2. 中国人看西方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联想：圆明园被烧、八国联军入北京、清政府不堪一击、丧权辱国、亡国灭种、奇耻大辱……宣教士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来到中国。

第八课

19世纪西方宣教士来华情景： 宣教与战争

一、19世纪西教士眼中的中国

1. 有着以偶像崇拜和迷信为特征的精神生活、堕落的社会道德；
2. 古老的文化；停滞、排外的民族特征；
3. 专横、排外、傲慢而虚弱的政府；
4. 是贫穷的国度，野蛮与近代文明之间的国家（文明、半开化）。

二、19世纪的宣教信息

1. 19世纪的宣教信息带有相当的强制性。那时的宣教士认为中国必须开放，他们才能在全国各地宣讲福音，建立宣教站、教会、学校、医院。中国人普遍归主，就能把中国带入现代化的基督教世界里。他们带着这样的理念来传福音，几经努力，收效甚微，也和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冲突，受到政府极大的压制，直到1910年后才有调整。
2. 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的宣教大会发出呼吁，要求宣教士去找出中国文化里可以与基督教并行不悖的部份；宣教士也要强调信仰中普遍的本质。

三、战争与福音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自传《西潮·新潮》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我们要认清历史，对不实之词要指出来以护教，维护信仰尊严；但对曾犯的错误也要勇于承认，在历史中有所学习。

A. 郭士立与鸦片走私

郭士立(K. F. A. Gützlaff, 1803-1851)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加入当时向中国出售鸦片的贸易公司，担任翻译。他的做法，为一些宣教士反对。

B. 在宣教与鸦片贸易之间

中国人常以为宣教士都支持西方向中国进口鸦片，

但从《中国丛报》1836-1840年发表的48篇有关鸦片问题的专题文章中，看见在鸦片贸易问题上，宣教士多从道德和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出发，视之为罪恶，进行抨击和谴责。

C. 宣教士眼中的鸦片战争

1. 宣教士对鸦片战争多采取支持态度：
 - a. 宣教士言论摘录：“我肯定在所有发生过的事件中都有神的手发挥作用”。中国需要“一记重击，以便从她优越和安全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中国必须屈服，或者灭亡。”鸦片战争是“人类最高的主宰利用英格兰来教训中国，使她谦卑。”“对于在这个确确实实正在衰朽的、崇拜偶像的异教民族中建立千百个传道团的事业来说，只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我们也许在犯错误，但这是神理所当然会原谅的错误。”
 - b. 在当时的宣教士心中，清政府的闭关和禁教政策，是导致宣教困境的直接因素。因此，他们认为一旦可以在3.5亿中国人中“自由交往”，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不必担心清政府的宗教迫害，那中国教会的快速发展就必然会来到。于是，在迫使清政府“开放”这一点上，宣教士和英国政客、商人的目标是一致的。
 - c. 这些宣教士根本没想到他们说的这些话，对于宣教毫无益处，更对中国教会的建立造成非常负面的后果和历史包袱。
2. 反省：
 - a. 基督信仰与当时的外在环境可以走得多远？有些地方，有些事情，到了界线就必须止步，以保持基督信仰的纯洁。宣教士对鸦片战争的看法是错的。
 - b. 宣教事业与不平等条约的关连，也影响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看法。

四、弛禁天主教

1.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时代的到来，基督教在华宣教从非法走向合法。宣教中心逐渐由澳门、香港、广州、上海，向北转移。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也由禁教逐步走向弛禁。
2. 1844年，耆英奏请道光帝批准，正式宣布对天主教弛禁。经新教宣教士通过法国使团进行交涉，新教也包括在弛禁范围之内。清政府宣布发还康熙年间没收天主堂房产，并惩办今后“滥行查拿”各地基督徒的地方官。天主教接受了清政府归还的土地。可是这样一来，中国人就要交出百年祖屋。天主教的反应，给中国社会很负面的看法。

第九课

19世纪天主教与新教在华发展情况

一、宣教与不平等条约有关系吗？

1. 1842年《江宁条约》（《南京条约》）《善后章程》—在五口自由进出及居留、领事裁判权。
2. 1843年《虎门条约》—可在五口的议定界址内建屋居住。
3.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五口兴建教堂。
4. 基督教合法化，宣教中心逐渐由澳门→香港→广州→上海。
5. 1858年《天津条约》—中国全境对外开放，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传教士和中国信徒。
6. 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容许宣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此条为法文版所无）。
7. 1860年—全境开放。

基督教在条约上被保护，可是，把宣教工作依附在不平等条约下，埋下难以预料的祸患和仇恨。也有一些宣教士和西方外交家看见问题：条约使中国人对西方宣教士与殖民主义等同看待，也违背了圣经。当中国教会也成为宣教的教会时，就需要反思：作为光明的儿女，当以光明的方式来处事。

二、新教在华宣教方法

1. 巡回传教、建立传教站、街头礼堂、教堂、学校、诊所或医院、宣教士及华人助手的住所、初信造就、建立教会……随着1860年全境开放，宣教士在各方面的努力，促使新教快速发展。
2. 1858年，中国差会有20家，宣教士81人。到了1889年，中国差会增为41家，宣教士1,296人。在1880年，新教已进入当时18个行省。

三、19世纪在华天主教的发展

1. 弛禁之后，在各地原本处于地下状态的天主教宣教士大为活跃。截止1858年，在满洲、蒙古和全部18个行省，都有天主教会。一些新的代牧区、监牧区陆续设立。
2. 1870年，洋人司铎250名；1890年，洋人司铎639名，华人司铎369名；1897年，洋人司铎759名，华人司铎409名。
3. 17世纪初，中国天主教徒约30万；至18世纪末，跌至20万；至1850年，升至32万；1870年40万；1890年50万；1897年53万。（和新教相比：在开拓期，新教宣教士的活动基本局限在5个通商口岸内，1853年各地新教信徒仅350名，至19世纪末增至5万余。）

四、基督教对中国的冲击

1. 由信仰导致的张力。
2. 一神信仰与偶像崇拜。
3. 生活规范的差异。
4. 教会组织与权力体系之间的角力。
5. 对清王朝官僚权威的挑战。
6. 对地方社会缙绅权威的挑战。

第十课

中外眼中的异端： 太平天国（1850 - 1864年）

一、洪秀全其人

A. 病中异梦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应试，未能遂愿，病倒异乡，回家卧床一个多月。其间作一异梦，梦见自己登上高天，遇见一位端坐在宝座上、极其威严的老人。老人自称生育了世间人类，亲授洪秀全一柄斩妖宝剑和象征权力的印绶，嘱咐洪秀全制服妖魔和劝人行善。还有一位他称作“长兄”的中年人助他杀妖。

B. 释梦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落榜，阅读7年前所得、梁发写的《劝世良言》，猛然醒悟，解开6年前病中异梦的含义。他认为书中内容与自己梦中见闻颇多相符，明白宝座上的老人即天父神，助他杀妖的中年人即救主耶稣，魔鬼即偶像。这个升天受命的神迹，使洪秀全相信自己就是要带领天下人重新敬拜神的使者。由此梦境获得的确信，伴随洪秀全终生。

C. 洪秀全的忏悔诗

“吾侪罪恶实滔天，幸赖耶稣救赎全。勿信邪魔遵圣诫，惟崇上帝力心田。天堂荣显人宜慕，地狱幽沉我亦怜。及早回头归正果，免将方寸俗情牵。”洪秀全自行施洗，并传道给密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给他们施洗，且劝说父母兄嫂相信神。1844年，他创“拜上帝教”，外出传道，先在家乡向客家同乡传，之后又从广东转向广西。

二、太平天国的颠覆力量

A. 颠覆既有权力结构

1. 齐客家—“天下一家”，“敬拜皇神，则为皇神子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
2. 反朝廷—称清帝为“阎罗妖”，满朝文武为“妖

徒鬼卒”；蓄发易服、攻城略地、分封诸王、设百官、开科取士。

B. 颠覆既有经济结构

《天朝田亩制度》：“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C. 颠覆既有社会结构

1. 拆家庭—全城采用军事编制划分男馆女馆，不论长幼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称。取消家庭，即使夫妻也不得同宿，禁止性行为。触犯第七天条（行淫）者，格杀勿论。直到1854年，杨秀清称接到天父圣旨，吩咐他铺排众弟妹“团聚成家”。
2. 更丧葬—“升天是头顶好事，宜欢不宜哭，一切旧时坏规矩尽除，俱用牲醴茶饭祭告神”；“俱不准照凡情歪例私用棺木，以锦被绸缎包埋便是”；“亲丧不必成服，尽准入场，有缟素入馆者斥之”。

D. 颠覆既有信仰体系

1. 毁偶像—“无像不灭”、“无庙不焚”，毁偶像时口念“恳祈天父神，将妖魔诛灭，大发天威”。
2. 贬孔子：
 - a. 在洪秀全的异梦中，天父斥责孔子未能清楚地阐述真理。初期洪秀全虽撤除塾中孔子牌位，但仍称“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
 - b. 定都南京后，明确指斥孔孟为“妖”，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
3. 拜上帝：
 - a. 7天一礼拜，礼拜前一天街道遍插礼拜旗，上书“明日礼拜，各宜虔敬”，另有士兵扛旗鸣锣于市。
 - b. 礼拜当天三更（午夜11-1时）起身，鸣锣为号，官兵至礼拜堂，堂内不燃香烛，点灯两盏，供茶三杯、肴三盛、饭三盂。各馆头领和先生坐中央，众人散座两旁。
 - c. 礼拜开始，两手按膝，齐声念诵《赞美经》，之后闭目面南长跪，由先生念诵写有全馆人名的黄纸《悔罪奏章》，念毕焚化，众人同时一跃而起，齐呼“杀尽妖魔”，礼拜仪式即告结束。

三、拜上帝教成为异端

A. 降神言

1. 1848年，拜上帝教在洪秀全、冯云山不在的情况下，不少信徒采用当地流行的“降僮”（交鬼）习俗，诡称神灵附体传言。其中，杨秀清托称天父神降附其身下凡，萧朝贵托称天兄耶稣降附其

身下凡。洪秀全回来后，承认了杨、萧各代天父、天兄下凡传言的资格。这是拜上帝教极大的转折点—巫术化。

2. 当天父下凡时，杨秀清便昏然睡去，称作“安福”，醒来后便号称在梦中得到天启，进而宣布天父圣旨。另一种方式是天父附体，借杨秀清之口直接下达圣旨。萧朝贵在发布天兄旨意时，方式亦同。

B. 改圣经

1. “其旧遗、新遗诏书多有记讹”，“朕来乃是成约书”。洪秀全把杨秀清、萧朝贵的言论记下，撰《真天命诏书》，视为经书。
2. 洪秀全把太4：16“其民住在黑暗者观大光，坐于死阴境地者自有亮发照之”（《和合本》：“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作如此解释：“神是炎，故有神光；太兄是炎，故是大光；朕是太阳，故亦是光。钦此。”
3. 对于圣经要求的忍耐和谦卑，洪秀全认为“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

四、太平天国的灭亡与负面影响

1. 洪秀全初信时曾经教导他的美南浸信会宣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 1802-1871），后来千辛万苦到南京探望他，指出其错。洪秀全却不听，最后罗孝全失望离开，并说整个太平天国是场闹剧，不但无益于传教，更带来害处。
2. 不论是在中国政府、士大夫、民间精英和宣教士眼中看来，太平天国都是异端，是可憎和邪恶的，需要镇压。因此，西方国家后期也转而支持清政府镇压他们。
3. 太平天国对基督教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因为太平天国在中国东南地区造成社会、经济、人民的生命财产等很大的损失，却又以天父神、耶稣基督的旗号来建立政权，使那些地区很长一段时期对福音和基督教，都存在恐惧和负面的想法。

第十一课

宣教士调和福音与文化的努力

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A. 丁韪良 (W. A. P. Martin, 1827-1916)

1. 美国人，长老会差会宣教士，在华生活 60 余年。
2. 倡导与儒家传统相调和，指出儒家传统与基督教存在共通之处，且后者还可以完善前者，补其不足。主张“孔子加基督”，即一个儒者可以不废除自己的信念而接受基督。原因在于“尽管各地都有孔庙，孔子并没有被神化。人们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守护神，只是纯粹的怀念和敬仰。因此，这并不是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直接障碍”。
3. 反思—儒家文本可信吗？因历来科举考试的确有人拜孔子。

B. 理雅各 (J. Legge, 1815-1897)

1. 苏格兰人，伦敦会宣教士。1843 年，他把马六甲英华书院迁至香港，被誉为“香港教育之父”。他翻译、研究中国典籍，推出“中国经典”和“东方圣书”两套丛书。1876 年，他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2. 他尝试融合中西文化，倡中国人所信奉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神。他看孔子是伟人，认为“他的训律对整个民族的影响总体来说是有益的，对我们基督徒也是重要的一课”，论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有诸多类似之处，例：对自省、美德、智慧的追求。

C. 卫礼贤 (R. Wilhelm, 1873-1930)

1. 德国人，属“同善会”差会，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
2. 他认为唯孔子的中和之道可致世界大同。儒学最可贵之处，是对个别性、局部立场的包容和因势而变、通贯古今的能力：“西国只知爱国，国之下缺家，国之上缺天下，非孔教无以弥补之”。
3. 他说：“不管是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中国心灵给西方人的两个启发：
 - a. 真正的宗教不是排斥，而是包容和调和；
 - b. 让人领会到神的内在性，神人相契。

二、西学东来

A. 傅兰雅 (J. Fryer, 1839-1928)

1. 英国人，1861 年到香港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63

年到北京任同文馆英语教习。

2. 1867 年的信函：“中国在今年刚刚从一个很长很长的睡梦中苏醒过来，看到了远远走在她前头的优胜者，促使她经历了激烈的斗争，终于行动起来参加这场竞争了。中国必须全力以赴，不然的话，她将远远的被抛在后头。”
3. 他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 28 年，译书 150 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军工、矿务学、冶金学、机械学、天文地理、农学、动植物学、医学、政治学等。创办格致书院、格致书室，出版《格致汇编》。

B. 花之安 (E. Faber, 1839-1899)

德国宣教士，著《自西徂东》。

1. 书中 72 章，问了 72 个问题，每个问题分 4 部份：
 - a. 问题的重要性；
 - b. 中国在该问题上的不足；
 - c. 西方在该问题上的优越；
 - d. 从基督教立场提出改良之法。
2. 他又把基督教的“爱”与儒家的“仁”作比较，把国际法与儒家的“义”作比较，把敬畏神与“礼”作比较，把近代科技与“智”作比较，把宗教道德与“信”作比较。

C.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1. 英国人，浸礼会宣教士。
2. 他的宣教策略从最初向老百姓传道，到后来转向精英、知识界。1876-1879 年，华北大旱，他在山东、山西赈灾，以清廉、爱心、服侍等无私精神服人，与清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也得到李鸿章赏识。李鸿章邀他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后主持广学会 20 余年。
3. 他鼓动变法改良，建议清政府改良农业，开矿设厂，发展交通，开办银行，促进贸易，广设西式学堂，容许自由传播基督教，并和西方各国保持友好关系。
4. 1898 年，在百日维新期间任光绪帝顾问。义和团事件之后，他建议筹办山西大学堂。他的福音预工做得很好。

三、夹缝中的华人基督徒

A. 晚清华人基督徒的身分调适

在身分认同方面，中国基督徒自绝于中国社群之外，不断受到误解、排斥及攻击。

1. 消极回应—沉默或进行疏辩，予以澄清和驳斥。
2. 积极回应—探讨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开展中西文化交流及冲突中的调适。

B. 调适的前设与推论

国人以“道本同源”来尝试调和中西文化，提出天道一元，落实出来呈现出3种形式：“原古儒非今儒”；“圣教非外来之教”；“儒学已失落，天道要补儒”。提出的具体调适方案有以下两个：

1. 合儒论—通过儒家经典中的“上帝”观、伦理观，提出儒家与基督教之间能够接触和沟通的共通点，消弭其间的对立与紧张，得出两者相通不相左的结论。关于孔子在基督教中的定位，有人认为孔子是天道在中国的代言人，甚至是神在上古时的使者、先知。
2. 补儒论—以批判和承继的态度，来论证基督教可以补足儒教的缺遗。当时中国基督徒的共识是，儒家传统的“人伦”精神虽有其价值，但不能圆满地解决所有问题。“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源头，可从基督教的创造教义中找到答案。真正达致五伦关系的和谐，不能靠儒家提供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自力和人为的方式获得，必须透过相信耶稣及圣灵的内在，才能实现。儒家的人伦学说，不能解决如何救灵魂、赎己罪的问题，也不能使人、神关系得以复和。孔子与耶稣的不同，在于“人道”与“天道”之别。孔子为圣，耶稣为神。因此，孔子只可效之为师，不可拜之为神。

C. 调适的危险

19世纪末，中国信徒大多持“补儒”论，以至于有宣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儒家化”倾向感到忧虑。至于“合儒”论，有宣教士认为是在传讲“另一种福音”——道德与善行的福音，而非救赎的福音。他们担心基督教在中国会变成混合主义的宗教，非耶非儒，亦耶亦儒，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异教。问题在于，虽然先秦儒家所言的“天”与“上帝”是有位格的，但这是否可以和基督教所信的独一真神完全等同？以儒家诠释基督教，是否忽略了两者的根本差异？

第十二课 晚清华人基督徒的状况

一、祭祖问题的调适方案

1. 绝大多数西教士从观察中得出结论：祭祖属于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因而予以禁止。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就必须放弃这项传统的习俗礼仪。这就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挣扎，成为当时中国人归信基督的重大阻力。纵观19世纪，并无华人基督徒公开主张容忍祭祖，因为他们无法否认，实际的孝道已经变质、异化为迷信的偶像崇拜。
2. 部份儒生背景的华人基督徒，从理想的应然角度出发，提出化解办法。
 - a. 折中论—找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性。“祭”原意就是敬拜神，另一流露就是“孝”。
 - b. 重新解释—解释“祖”是“本”，“宗”就是“根”。从这个角度看，天父才是根本，祖宗的祖宗就是天父。

二、大米基督徒

宣教士来华后，见国人之困乏，例如小女孩失学，于是办小学，给女孩子读书的机会。来学校读书者，会给大米和几文铜钱。这类福利事业固然有其贡献，但同时也制造出一些信仰不纯的信徒。人称这样的信徒为“大米基督徒”。以下举两个例子。

A. 郭士立的“福汉会”

1. 1844年，郭士立在香港建立“福汉会”，意思是希望中国人信道得福。
2. 郭士立的宣教理念，是鉴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掌握中国语言的难度，所以认为训练并依靠中国人向中国人宣教是最佳策略。
 - a. 他在澳门一带，以经济手段聚集、雇佣一批穷困的中国人，派他们去内地传教，称为“布道者”和“散书者”。经过短期考察后，为其中一部份人施洗，再给予短期培训，便派他们带着福音单张和小册子，前往内地宣教。
 - b. 接受福音的新信徒会被带到香港，由郭士立亲自考察，接受教义方面的培训。几个月后，便为他们施洗入会，再加以神学培训，包括研读圣经和传道书籍。约一个月左右后，这些新入会者也成为“布道者”和“散书者”，派往各地去散书和布道。
3. 福汉会如滚雪球般迅速发展，从1844年的37人，1845年底210人，1847年300人（其中50人任传道），至1849年已发展至1,800人。活动范围以广东乡村城镇为主，后发展到江西、广西和

福建。据郭士立在1848年的报告称，福汉会的宣教师已分布在中国18个行省中的12个。

4. 当时典型而传统的宣教模式，是由一个或几个宗派组织差会，由差会派遣传教士到海外传福音及建立教会。但郭士立创新的对华传教模式，是由传教士组织独立的、没有宗派背景的传教团体，由中国信徒自己管理并从事传教活动。
5. 1849年，一些宣教师趁郭士立回国之机展开调查，揭露福汉会快速增长背后的内幕。该会成员大多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谎报数据，诈骗经费；一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外出传教，反而把圣经以低价卖回承印书商，而书商再以高价卖给福汉会。
6. 不过，从戴德生的内地会的宣教策略和方针，就是深入中国内地宣教，避免宗派背景的组织形式等，可以看到内地会与福汉会之间在策略上的密切关联。因此，戴德生称郭士立为“中国内地会的祖父”。

B. 洪秀全

1847年，洪秀全来到广州，在美国浸礼会宣教师罗孝全那里逗留了3个多月，得以直接阅读圣经，并接受较正规的真理栽培。当洪秀全提出受浸要求后，教会便指派一个委员会来考查他的情况，甚至到其家乡花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对洪秀全是肯定的。可是，就在受浸前夕，罗孝全两名中国助手嫉妒这位颇受青睐的年轻人，故意劝洪秀全提出今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触怒了对此极为敏感的罗孝全。洪秀全被视为动机不纯，洗礼也因此无限期推迟，结果洪秀全拂袖而去。

三、中国传道人的状况

中国传道人非常卑微。他们在国人心中，是“吃洋饭的”，得不到尊重。在教会里，洋人才有话语权，中国传道人只能做洋人助手和跟班，地位卑微。他们的下一代，因见父辈的情况，即便接受了很好的训练，往往不想做驻堂传道，而选择做买办、教授或巡回布道者。

四、困扰中外的教案

1. 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内地的过程，也是全国各地反教浪潮风起云涌的过程。从1840-1900年，全国大小教案共计400余起，其中大部份集中于19世纪60-90年代这40年间。这和全线开放引发民教冲突有关。
2. 引发教案的实与虚：
 - a. “兴”、“毁”之间——“吾非除旧何由布新？将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这使教会与

官绅进入种族和文化优越感的对立之中。

- b. 近代基督教的宣教事业，在中国社会形成具有政治意义的势力，尤其宣教与不平等条约的关联，更使中国各阶层人士把基督教与列强的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一旦入教，就可利用洋人势力与地方缙绅对抗，造成权力局势转变，引起地方缙绅担心。
- c. 太平天国之乱在官绅、百姓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惧阴影。
- d. 中西社会文化、宗教礼俗方面的冲突——“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

第十三课 晚清教案与反思

一、教案的诱因—反教谣言

当时有不少对宣教师的谣言，说他们“采生折割、诱奸妇女、迷药、投毒、剪辫、教堂藏军火、刨挖坟墓……”这些谣言的制造、传播、利用者，多为士绅、官员、匪徒、游民，但民众都相信这些谣言。教案的高峰是义和团事件。

二、义和团事件及反思

A. 起因

1. 当时山东等地，向来有不同的会馆教人习武打拳。1900年，山东干旱，民众认为是因为宣教师得罪了地方偶像神祇。
2. 在政局方面，当时西方人想藉着扶持光绪推动改革，以打击慈禧垂帘听政。这促使慈禧想利用民间力量，攻击西方势力。最终，在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事件，也称为“庚子教难”。

B. 罹难人数

在庚子教难中，山西遭杀害的宣教师最多，因为山西官员曾在山东与洋人起过冲突。

1. 天主教遇难神职人员53人，信徒18,000人。
2. 东正教在北京的北馆被烧毁，华人东正教徒222人被杀。
3. 新教宣教师及其家属189人罹难，内地会宣教师占三分之一以上，共58人，其中孩童21人。信徒被杀数字难以统计，有说1,912人，也有人估计多达5,000余人。在众多地区中，以山东、山西、河北、东北教会的损失最大。

C. 对华宣教的反思—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庚子教难给宣教师很大冲击，一则校正了西方为本

第十四课

百年大会与宗教自由请愿之争

位的心态，二则省悟往后宣教策略要转变。按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 Hart, 1835-1911）的看法，传教士和教徒的地位，应由法律明文规定。教徒应当遵守法律，传教士则不应介入地方诉讼事件，以免招惹当地社会的不满和敌意；否则，“五十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

三、扬州教案及反思

A. 事件经过

1. 1868年6月，戴德生和同工到扬州城租房。8月22日，寓所被纵火围攻，同工受伤，财产遭抢劫。清廷派兵驱散人群，逮捕抢掠及纵火疑犯4名。英领事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施压，继以军舰示威，几乎酿成战事。
2. 英国本土政客及商人不赞成宣教士在内地传教，认为有损英国贸易利益。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社论，抨击内地会的宣教策略，认为戴德生几乎引发中英战争。

B. 内地会的维权原则

1. 戴德生在极度苦闷中，重新思索内地会对在华民教冲突所持态度，进而反省基督教宣教士与政治势力的关系，提出在民教冲突中不诉诸本国领事及拒绝接受赔偿的原则。
2. 《原则与实践》（1884年）：“倘若在内地发生麻烦或滋扰，可以友善地向当地中国官员陈情。如果他们不作补偿，那些受害者就应满足于将他们的申诉交托在神的手中。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所有传教士都不可以向英国当局上诉。主的命令是应遵循为最终的凭靠：倘若他们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该离开去另一个城。”

C. 宣教策略的调整

英美政府和教会内部，都对教会和宣教士涉足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活动，作出相应限制。英国驻华公使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禁止各地宣教士直接到官府，为信徒诉讼等事出面干涉，避免引发教案；如有必要与官府交涉，必须经由各地领事进行。德国在上海的报纸也提出，宣教士不得从事宣传基督教和知识以外的工作，违者予以处罚，甚至驱逐。

一、百年大会“传教士问题”的决议

1907年，中国宣教士召开“百年大会”，在传教士问题上，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决议：

1. 重申传教士只负有道德和灵性的使命，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2. 要求传教士在中国民族主义上升的时代，注意教会不被革命所利用，不要从事反对政府的行为。

二、宗教自由请愿之争

A. 请愿运动

1.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被视为立宪政体优越性的明证。1905年，清廷派出5位大臣出国考察日、英、美、德、法，结果一致推荐立宪政体。1908年，拟就《宪法大纲》、《选举法大纲》等相关法典，奏请批准，声明将于9年后颁布实施。这时革命分子也开始有零星起义。
2. 立宪派鉴于国内危机日趋严重，在1910年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梁启超疾呼：“吾辈为预防全国革命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此原系至缓进之法”。可惜，清廷没有回应。社会失去耐性，人心思乱。

B. 宗教自由请愿

1. 闽南的许子玉和北京的诚静怡，出面呼吁中国基督教会也应参与其中，组织宗教自由请愿会。起因是《宪法大纲》之国民权利义务一章中，并未载有“宗教自由”一条；而《选举法大纲》的选举章程，又规定传道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上海、北京部份教会的领袖响应呼吁，发起请愿行动。热心者撰写文章解释立场，并号召更多基督徒加入请愿行列。然而，大部份教会反应冷淡，甚至有人声言反对请愿。

C. 不同见解

1. 反对请愿理由：
 - a. 全能的神必保守教会免受损害。
 - b. 基督徒追求的是永恒的事物，何必计较地上享有的权利。
 - c. 宗教不自由的环境正好磨炼信徒，可净化教会。
 - d. 请愿的对象是教外人——清朝政府，而非祈求神。
2. 支持请愿者的理据：
 - a. 宗教自由可分为灵性上和政治上。前者不必也不能通过请愿而得，而后者则属国民应有的权利。宪法应明文规定人民有信教、传教、植堂、立会

的自由，且不受干预。

- b. 宗教自由的落实，将影响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
- c. 宗教自由不但是政治问题，也是基本人权的课题。人人都有天赋的自由，而宗教信仰的自由是其中最重要部份。

D. 争论的平息

1.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呼吁“破除成见，消灭党界”。幸好这次争论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双方都没有料到清朝政府如此迅速地瓦解。
2. 信仰自由的承诺不是来自清王朝，而是载于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人民，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六条，人民得享有左列各项之自由权：……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三、基督徒与辛亥革命

A. 基督徒的角色

1. 兴中会时期（1894-1905年）的反满革命，主要是由基督徒推动和领导的。1903年之后，基督徒仍积极参与，并扮演重要角色。
2. 两湖圣公会日知会，是唯一一个正式以教会机构名义搞革命的组织。
3. 基督徒革命者中，不少是传道人、牧师、信徒领袖，甚至是教会本土化的发起人和推动者。

B. 基督徒革命者语录

1. “我革命所以能够成功，乃完全仰赖神的恩助。”——孙中山，1911年
2. “余遂转忧为喜，确信神默佑我革命事业，终必成功。”——宋居仁
3. “中原有士兆民痛，神无言百鬼狞。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身在縲绁，心在天堂”——刘敬安于狱中
4. “我期望中国千千万万的人都皈依基督教，接受福音，享受平等、民主、博爱的幸福生活。”——宋耀如受洗时言

C. 基督徒革命者的身分定位

1. 不满现状者——会党、新军、华侨、新式知识分子。
2. 社会的边缘人物——不论是主动或被动，他们都自我识别为疏离者。作为基督徒，他们与国人关系疏离；作为“叛逆者”，他们与朝廷之间更是疏离。
3. 爱国的民族本位主义——他们并没有因为成为基督徒，就失去中国人的身分意识和对祖国的责任感，却自愿地选择作拯救祖国的革命者，从理论的批判，发展到行动的批判。

D. 新价值的发现

1. “神比一切超越”的观念→君权的非绝对性，从而突破传统价值“忠君”的羁绊，对王权进行彻底的批判。
2. “拯救”观念→强化了救国观念，由个人的拯救延伸到社会的拯救，实现了以福音救人→以革命救国之间的转换。
3. “基督十字架的爱”→塑造了革命者的品格，带给他们牺牲的勇气。
目标——在中国实现基督教价值和理想，让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人民摆脱黑暗和愚昧，过上幸福的生活。

E. 反思——社会革命是教会的使命吗？

1. “以革命救国”和“以福音救人”，两者手段不同。前者不排除暴力，后者则不然。对基督徒革命者而言，暴力是革命救国的必然，爱与暴力并不令他们感到两难。
2. 革命并非教会本身的使命，故基督徒的革命并非教会的救国运动，而是教会中信徒的救国运动。
3. 教会对革命的间接影响，表现在并非有意地培育及影响了基督徒革命者的革命意识，同时给予他们不少援助和掩护。
4. 基督徒革命者在教会圈子中是独特的一群。在他们看来，教会事业（包括传福音等）与革命救国之间并无抵触。他们中间有人在革命中传道，又在传道中革命。

第十五课 世界潮流与基督教

一、20-21 世纪初世界潮流与中国人的危机

1. 20世纪，科学和民主成为世界巨大潮流，也影响中国人的思想。
2. 1840年后，中国面对列强步步进逼。其后，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中国失去自信，也对儒学产生怀疑。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俄国，中国朝野为之震惊。
3. 当时中国人想到的解决之道是“洋务”和“变法”。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科学救国。”在“变法”方面，也在制度上追求共和、宪政和民主的突破。

二、宗教大辩论

A. 新文化运动（1915-1919年）

这运动公开挑战传统的儒家思想，介绍西方思潮。蔡元培办《新青年》杂志，推动新文化运动。当时，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都以北京大学为基地，纷纷发表文章。

B. 少年中国学会

1919 年在北京成立，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1920 年，巴黎分会提议只准没任何宗教信仰者成为会员，提出问题：“人是否宗教的动物？新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是否还有存在价值？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当时法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持否定的看法。

C. 少年中国学会系列讨论带出的影响

少年中国学会举办系列讲座，发表文章，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讨论宗教问题，分为反对宗教和赞成宗教的两大阵营，为之后的反宗教运动提供不容忽视的思想资源。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科学”和“理性”，西方科学精神大有可能取代传统儒家思想，占领思想权威高地。在不少知识界人士，尤其是青年人眼中，宗教不合科学，违反理性。当时胡适说：“这三十年以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D. 反思—科学万能？

科学真是万能吗？科学与民主和信仰的关系及影响，到底在哪里？到底什么是最高权威？

三、中国基督教在 20 世纪初发展的背景

A. 前所未有的机遇

进入 20 世纪，中国无疑跨入了一个新时代，即将或正在发生许多重大变化。中国人的危机感日深，国族意识日强，思想空前活跃。渴望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情，暂时化解了人们对西方的抵触。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基督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 1900-1920 年的 20 年中，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受到美国宣教运动极大的影响，有很迅速的发展，堪称“黄金时代”。

B. 新教振兴

新教占优势的国家获得工业化发展的绝大部份利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只是时间问题。秉承 18、19 世纪的宗教觉醒，新教教会在迈入 20 世纪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普世宣教。此时的新教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更乐观，更有信心把信仰传到非基督教国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成为最大的宣教工场，新一代的宣教士纷纷奔赴中国。美国宣教士的人数很快超过英国，

其中不少人的世纪梦想，是盼望中国成为拥有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基督信仰的国家。

C. 美国教会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1. 东部—1802 年，耶鲁大学出现属灵复兴。全校三分一学生信主，带动其他大学属灵大复兴。
2. 西部—巡回布道员骑马到各地布道，展开露天聚会，有时可以延续 4 天 4 夜，上百人归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二次觉醒运动是平信徒所推动的，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平信徒。他们不愿接受教会建制，包括教会组织、宗派礼仪、神学教义的约束，要求自由地实践信仰。他们成立超宗派、跨宗派或无宗派的福音机构，推展各样事工，把关注点锁定在布道、服务之上。这些工作都与神学讨论无关，不牵涉传统的教义和礼仪，更不用受过训练的专职教牧人员负责。由机构推动各种社会改良与救济事业，例：禁酒运动、废奴运动、青少年事工与海外宣教。

D. 青年会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

原本信仰所强调人的堕落和不值得信任，此时显得陈旧，“是不能和正在上升的美国荣耀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自我价值感相适应的”。他们认为美国是特殊的民族，是神拣选来改变整个世界的国家。1851 年发起的美国青年会，带动了基督徒大学生的海外宣教运动。他们的口号：“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全世界”。

第十六课

20 世纪初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一）： 黄金时代

一、《和合本》圣经面世

1. 中文圣经最初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1842-1860 年五口通商时期有《委办译本》。就“God”一词，英国圣经公会译作“上帝”，美国圣经公会则译“神”版圣经。
2. 在 1860-1900 年的宣教发展期，杨格非 (J. Griffith, 1831-1912) 译《浅文理译本》。其后，宣教士在各地都出版方言译本，例：广东话、上海话、福州话、厦门话、宁波话、温州话，也把福州话用拼音写出，以便老人也可以阅读。新教宣教士来华百年，一直致力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3. 1890 年，各地宣教士在上海举办译经大会，最后议决以《英国修订译本》(ERV)，作为翻译中文译本的根据，并成立了 3 个委员会，分别翻译

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圣经。1907年，百年大会决定合并深浅文理译本。1919年，《文理和合译本》面世；同年，《官话和合译本》也同时完成，后改为《国语和合译本》，简称《和合本》。《和合本》是中国第一部由各差会合作完成的白话文译本，成为全中国教会统一使用的圣经，一直到今天。

二、大复兴运动

A. 东北大复兴

1. 点燃复兴之火的人是古约翰 (J. Goforth, 1859-1936)。古约翰的第一个福音工场位于河南北部。戴德生写信给他：“弟兄，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以膝代步啊！”
2. 1907年，他去朝鲜，适逢平壤大复兴，他停留了3周，归途中把此行见闻在东北一些教会中分享。1908年，古约翰再度赴东北领会，带来了东北教会的大复兴。
3. 他在东北各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大致围绕一个主题：“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在空间上，这次复兴超出东北，影响中国其他地区；在时间上，1908年高潮之后仍余波未尽，有些地区甚至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才告终结。

B. 山东大复兴

1. 早在1908年，美国长老会宣教士郭显德 (H. Corbett, 1835-1920) 就开始在山东各地进行福音布道。此后，他的中国弟子丁立美牧师 (1871-1936)，开始在山东倡导学生福音会。
2. 1910年，由山东潍县广文学校发起的“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推丁立美为干事，唤起了基督徒学生立志终身传道的心志。团员有1,170人，立志传道的有530人。
3. 1925年，丁立美继续往各地布道，足迹遍及河北、河南、东北、长江下游一带，复兴之火熊熊燃起。各地教会仿效山东农村搭台唱戏的地方风俗，在会场扎起帐篷或搭戏棚，因此多被称为“大棚布道”。

三、新教信徒、宣教士、差会数目大增长

1. 中国基督徒人数：
 - a. 1900年新教信徒8万，1920年达36万。
 - b. 1918年各省领圣餐信徒（34万）百分比—广东18%、山东12%、福建11%。
2. 外国宣教士在华人数量—1900年1,500人，1905年3,445人，1914年5,400人，1919年6,636人。20年间，增加4倍多。

3. 来华基督教差会数目—1900年61个，1906年67个，1919年增至130个。

四、合一的议题

A. 宗派林立

19世纪的美国，不断出现新的宗派。至1890年，全美已有143个宗派。这也影响到中国教会宗派林立。在1907年的百年宣教大会，中国教会的合一与自立是个重要议题。资深宣教士汲约翰 (J. C. Gibson, 1849-1919) 在发言中期望：“我们或可以在这第二个世纪内，将一个教会，而非50个互不相关的组织交予中国人，作为外国差会的遗产。”

B. 爱丁堡宣教大会 (1910年)

1. 主持者—穆德 (J. R. Mott, 1865-1955)。
2. 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代表。
3. 会议目标—全面检讨更正教的普世宣教工作。这个宣教大会是近代教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不同教会的领袖第一次聚集在一起认真交换意见，共同思考推展福音工作的策略。
4. 决议—成立“国际宣教协会”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保持与各地区、宗派、差会的联络，推动普世差传事工有效和持续地展开。

C. 全国基督教大会推动合一运动

1. 轰动的7分钟演讲：
 - a. 爱丁堡大会有5位中国基督徒代表参加，北京的诚静怡作了7分钟限时演讲，代表中国信徒向西方教会首次表达中国教会寻求自立的观点，批评差会带给中国教会的宗派和宗派主义，公开宣称“我们中国基督徒对你们的宗派主义毫无兴趣”。
 - b. 大会成立续行委员会，在穆德的主持下，调查各地宣教的方法与问题，维持并推动教会在宣教事工上的合作。诚静怡作为中国代表当选为委员。
2. 成立中华续行委员会：
 - a. 1913年穆德来华，同年3月，中国教会领袖与西教士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宗旨：“使全体信徒渐归合一，并使世界万民咸识基督为神子，即为人类之救主。故愿在中国各教会，亦于此时实行统一。”
 - b. 全国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根据爱丁堡会议的模式，选举和组织了“中华续行委员会”，具体地推动中国教会合一。中华续行委员会由中西人员组成，纯为顾问性质，是中国各教会与爱丁堡续行委员会以及西方各国宣教机构的联络机关。诚静怡当选为中方干事。
 - c. 中华续行委员会的委员包括了在华大部份公会，

如圣公会、长老会、美以美会、伦敦会、宣道会、浸信会、内地会、信义会、巴色会、美部会、监理会及循道会。许多海外宗派在华团体逐渐联合起来，统一名称，整合机构管理及事工。各信义宗成立“中华信义会”，浸礼宗成立“中华浸信联合会”，圣公会成立“中国圣公会”，各长老会成立“中华基督教长老会”，监理会、美以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等合并为“中华卫理公会”。

3. 两个最大的成果：

- a. 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总会—1918年，长老、公理、伦敦3会各派代表组成12人委员会，讨论教会合一的宪章基础。在1922年全国大会之先，这3个公会正式举行代表大会，成立临时总会。1927年10月，他们在上海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总会，融合16个宗派，信徒12万，占全国信徒三分之一。
- b. 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委办会是个临时委员会，属于过渡性质，存在至下一次的全国大会，届时将成立正式协会。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产生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目的：“培养与表达在华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合一，以及实现世界上教会在主内为一体；并且为这项目标，提供一个联合祈祷与合作的机会。”协进会的功能“仅为顾问与咨询性质”。

五、天主教的高速发展

A. 发展概况

1900年，新教在华信徒有8万，天主教徒有72万；1920年新教在华信徒有36万，天主教徒在1912年就有143万。1900年，天主教神父有1,375位；1912年，就有2,298位。

B. 发展重点

1. 除了新的教区相继建立之外，1912年又成立“公教进行社”，意在激励华人信徒邀人进入教会，且以家庭为重点。在培育神职人员的学术水平方面，天主教远远超过新教。1903年3月，耶稣会在上海创立震旦大学，是当时天主教在华唯一一所大学。
2. 天主教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水平之高，新教无法望其项背；但在普通教育方面，新教教会的影响更大。原因在于天主教决意把主要力量用于为信仰赢得灵魂这方面，因而把学校教育视为次要。表面看来，尽管20世纪初在华天主教人数增长很快，但没有给中国社会的整体生活带来明显影响。

六、中国东正教会的成立

1. 1900年之后，最大的变化在于俄罗斯正教会开始致力于对华人宣教，在直隶、湖北、河南、江苏、蒙古地区共设有32个宣教中心。1902年，任命了北京主教，扩大了在华教士的人数；此外，还办有15所学校，共500学生。1906年，在华俄罗斯正教信徒约3万，其中华人信徒725人；至1914年底，华人信徒为5,035人。
2. 1917年沙皇政府倒台，逃亡的高级神职人员在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Karlovcı, Serbia)成立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1922年，中国东正教会断绝了和莫斯科牧首区的隶属关系，归属流亡在外的主教公会议。1924年，俄罗斯正教驻北京布道团正式改称“中国东正教会”，在北京设立总会，下辖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新疆教区。

第十七课

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二）： 受挫

一、非基督教运动

背景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民族主义大潮。中国人的自尊因巴黎和会（1919年）受到重创，从而掀起排外风潮，也导致知识界更倾向于用激进的社会革命方式来解决问题，并引苏俄为外援。

A. 第一波非基督教运动（1922-1923年）

1922年，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预备于4月在清华大学召开。3月9日，北大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指责基督教为资本主义先锋、反科学、束缚思想、麻醉青年、文化侵略，并表示“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一时间全国各大城市大学生纷纷响应。

B. 第二波非基督教运动（1924年）

因《中华归主》和《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报告书》的出版，引发“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政府接收教会学校。1924年8月，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重组。

C. 第三波非基督教运动（1925-1927年）

1. 由“五卅惨案”引起，基督教被攻击为“帝国主义走狗、侵略的工具”，有人公然提出“打倒基督教”口号，部份地区出现暴力攻击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时间基督教成了众矢之的，受到社会的公开谴责和攻击。运动的重心在于反

对不平等条约，反对教会教育，要求收回教会学校教育权。

2. 20 世纪的知识分子和国共两党的反教倾向，完全不同于 19 世纪由官绅发动和领导的排教风潮。新文化运动以及非基运动中走在前沿的众多知识分子，是代表着出自国内外新式学校的一辈新式人物。他们承袭了上一世纪反教者内心深处强烈而充满危机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但所使用的反教理念和思想武器，已不再是传统的华夷之别和人禽之辨。在民族主义的内核之外，包裹着来自西方的思想和理念。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都在反对基督教的旗帜下相聚起来。

二、北伐战争时期

1. 1926 年秋，北伐战争爆发。北伐军所到之处，教会成为攻击对象，教产被占、被毁、被抢劫、被没收，牧师被抓坐牢游街，还有地方牧师被害。乡村教会受害最甚，甚至无法公开敬拜，信徒只能偷偷地过信仰生活。当时最流行的标语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基督教！打倒资本主义的基督教！打倒文化侵略的基督教！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打倒资本家的走狗！打倒西国人的走狗！”
2. 1927 年 3 月 24 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一些身穿军服的人持枪闯入西人住宅、使馆和商会抢劫，殴打西人，杀害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J. William, 1871-1927）。英、美两国军舰炮击南京。
3.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开始清党，国民党放弃大革命时期的排外立场，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禁止干扰教会及退还教产的训令。

三、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

A. 背景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让人感到理想幻灭，上一世纪的乐观、自信，渐渐被悲观和迷茫所取代。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问题丛生的社会，教会该如何回应？可以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信仰对当今世界有何言说？不同的策略引发激烈的争论。
2. 美国在 20 世纪初崛起——美国在 1860 年代至 1920 年代期间发生巨大改变。
 - a. 城市化——美国从以乡村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都市化与工业化的类型。1920 年，美国首次举行人口普查，当时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多过农村地区。世界各地有数以百万人移民到美国。
 - b. 工业化——新的工业文化兴起，也带来地质学、生物学、历史批判学的发展。

教会针对时局变化的不同回应，最终造成信仰冲突。

B. 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

1. 基要主义者——竭力保存圣经的教导，珍视神学上的传统，视社会思潮的变迁为对圣经与教会的直接冲击。教会从 18、19 世纪原本全力委身的社会行动与寻求社会公义的努力中转身退出。这种撤退的策略开始成为基要主义在面对新兴工业都市的挣扎与改变时所采用的模式。
2. 自由主义者——倾向以乐观主义来欣然接受改变，视之为机会。全面接手基要主义者让出的阵地。

C. 分道扬镳

双方的冲突在教会、学校、社会等方面全面展开。冲突导致双方出现极端两极化的倾向：

1. 社会：
 - a. 基要派——强调个人内在的敬虔，放弃他们向来对社会公义的承担。
 - b. 自由派——拥抱新的社会福音。
2. 教育：
 - a. 基要派——对新的学习感疑惑，尤其是在日渐自由主义化的大学。
 - b. 自由派——对新的学习持开放态度，例：进化论、圣经批判、信仰比较等。
3. 末世论：
 - a. 基要派——等待基督再来，把自己带离这个邪恶堕落的世界。
 - b. 自由派——盼望神的国在世上建立。
4. 价值观：
 - a. 基要派——强调个人价值。
 - b. 自由派——注重社区价值。

D. 争执在中国处境中的表现

1. 新派神学早在 1910 年代就引起宣教士的关注，担心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取向，导致福音精神被歪曲。但那时没有出现公开的争议。
2. 1920 年以后，两派的战火终于从北美燃至中国，分歧公开化和尖锐化。基要派当年即组成“中华圣经联合会”。1922 年以后，基要派与新派的论争在中国日渐加剧。此后，虽然保守派仍然坚持合一的理想，却在合一的具体措施上，表现出对以往的合一模式失去信任。

四、总结

1. 在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需要回应的时局与挑战：
 - a. 1915 - 1919 年——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 b. 1922 - 1927 年——非基督教运动。

- c. 1924 - 1925 年—回收教育权运动。
 - d. 其他—不平等条约、国家危机、劳工问题、乡村重建问题等。
2. 反思—面对不同的社会议题，要以圣经作为最终的依据。

2. 青年会逐步从强调个人救赎，转向社会变革，主张道德堕落是社会问题，而不仅是个人问题，社会应该为不道德和贫穷负责。社会福音透过青年会，强烈地影响了宣教运动，尤其影响了亚洲许多教会。

第十八课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时对局的回应

一、合一运动触礁

1.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面对三大社会问题：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浪潮。面对反基督教运动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回应是提倡废除不平等条约，促成本色化的中国教会（包括教产与教权的移交），并指出宣教士过去的失当。
2. 部份宣教士不愿卷入政治，而且不认同协进会的主张，进而抨击并退出协进会。合作运动触礁，因为协进会从未得到宣教士的全面支持，甚至在筹备中即遭美南浸信会拒绝。另外，虽然有些基要派一度参加协进会，但也逐渐退出。1926 年 3 月，协进会的主力之一—中国内地会，决定脱离；不久，宣道会也表示不再参与。协进会所面对最为沉重的打击，是 32 位宣教士联名发表公开信，指责其越权，并因其政治活动导致教会分裂。
3. 此后，双方虽不再争执，但教会间的合作精神已无法再如以往。“中国教会”的梦想触礁，这场教会合作运动失去动力和空间。

二、基要派华人牧者对时局的回应

基要派华人牧者以王明道为代表。这派认为信徒唯一的要务是传福音，不应浪费时间、精力于文化或社会建设。基要派的前设：

1. 不可以忠于信仰与文化两个主人；
2. 基督徒一定要与旧人及其生活方式全然割断，“文化改造”无疑就是被世界骗了；
3. 基督来，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摧毁它；
4. 基督徒若真要改造世界，只有透过好行为来为基督作见证，而不是通过实际事务的参与。

三、自由派教会领袖对时局的回应

A. 美式自由派神学—社会福音的兴起

1. 社会福音宣称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赢得或改变个人，而且是将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的关系、工业、社会、种族和国际都基督化。这是所有任务中最重要的。”

B. 基督教救国

1. 中国青年会的干事对表现在社会福音中的基督教自由主义，回应积极而热烈。在中国工业改革、乡村重建，以及国际合作问题上，他们成为输入社会福音观念的先锋和领导力量。
2. 青年会在中国的根本目标：“在我们这一代，让我们的祖国和世界福音化。”奠基人来会理 (D. W. Lyon, 1870-1949) 的工作原则：“我们不是来传教，而是来服务的。”他们要把青年会建成一个服务性团体，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禁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体育活动、公共演讲、兴办宿舍。1919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青年会把工作重点从社会服务，转向社会变革和政治重建方面，以回应中国救亡图存的这个迫切需要。
3. 中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福音者分享着同一目标的许多方面：
 - a. 吴耀宗—教会存在的目的，仅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个人能够从物质利益、政治社会不公平和压迫中得到自由和解放的理想社会。”（1934 年）爱的精神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它的追随者，为社会公正和社会改革而斗争。神的国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它“将会在人世间实现”。
 - b. 赵紫宸—“如果基督教在中国不能像在西方一样，成为社会重建的基础，它就会失败。这些社会重建的可能性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于基督教的正义中，会在神之国中传播并臻完美。真理是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因为个人救赎是通过社会重建的更大任务来完成的。”“中国的年轻人，为你自己而发现耶稣。”
 - c. 吴雷川—“我现在更能理解到耶稣基督的伟大，他不仅是宗教领袖，而且是社会改革家。他宣讲一个新的和理想的社会—天国，在这个新的社会里，基本环境是经济重建……更重要是认识到，人类的罪孽和苦难都因错误的社会环境、错误的社会观念和实践、生活和社会关系的邪恶方式引起的……一些人认为儒学思想的目标总是强调实践，与国家治理关系紧密；而耶稣的教诲是永远不会涉及政治的天国，但有时他教导他的弟子反对现在的体制。”

四、本色化神学

在 20 世纪 20 年代，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中

第十九课 20 世纪初中国教会内部的建造

国教会在神学思想方面兴起了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讨论，直接的目标就是摆脱“洋教”的蔑称。以下是 3 个本色化神学的方案。

A. 自足型

主张信仰中的要目全在中国文化内，基本上就是儒家思想。代表人物：

1. 吴雷川——“道”与“教”的分别在于，道为真理，日光之下只有一个；而教则是宗教，儒家、基督教都是其中之一。道为本，教为末，后者彰显前者，所以人要注意的是道，而非教。
2. 谢扶雅——儒学与基督教应平起平坐，提出再编圣经，即删去其中与中国人无关的部份，并收入中国古籍的精华，使我们有一部“本色化的圣经”。

B. 平等型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平起平坐，可以沟通对话，进而彼此协调。代表人物：

1. 范子美——最纯正的基督教和最优秀的儒学，可以合成一个全新的“东方宗教”。
2. 封尚礼——强调孔孟崇高的伦理思想，与基督教伦理教训合起来，便是一条互相沟通的桥梁。他提出“中庸神学”：“中”是特殊启示中的神道，即圣经；“庸”是普通启示的理，即儒家文化。两者合起来，就是信仰与文化的接触点。

C. 补足型

1. 一切文化与信仰接触的最高原则，是耶稣的宣告：不是废掉，乃是成全。中国文化有不少弱点，需要基督教的信仰来使它丰富起来。
2. 代表人物：赵紫宸、刘庭芳、诚静怡。他们的前设：
 - a. 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被神保存于历世万代中，神也藉此向中国人显明。
 - b. 启示需要某种文化形式作媒介，使人能明白启示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不变的，但媒介却可以更换。
 - c. 中国人不必惧怕儒家与基督教思想接触，因为它们可以彼此互通优良因素，并有足够力量改造次好的。

五、总结

今天中国教会也有不少要面对的议题，例：文化使命、社会转型、贪污腐化、三农问题、自然环境、食品安全等。我们又将如何处理面对？对应不同议题，本色化神学在海外是有市场的，例：台湾的“乡土神学”、香港杨牧谷牧师提出的“复和神学”等。神学就是以神的道，回应现今时代的问题和挑战。神学是很有时代感的，并非教条。教会要倚靠神的道、神的灵，来解答时代的处境和挑战。

一、自立运动的展开

A. 宣教士的提倡

中国教会在教会治理和践行使命层面回应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进一步推动教会自立运动。

1. “三自”（自立、自养、自传）理念的提出——1877 年，第一届宣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北美长老会的白达勒（J. Butler）提出自立、自养的主张，认为由本地牧师牧养的教会，是基督教植根于中国的最大保证。
2. 1907 年的百年大会，在汕头宣教 30 多年的汲约翰（J. C. Gibson, 1849-1919）作了《中国的教会》的专题报告，承认民教纠纷和教案的发生，是传教士在中国培植西方基督教的结果；在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大觉醒的今天，中国教会也不愿意再受外国控制。这时期，中国教会已有少数信徒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组织了若干不受外国差会人力、财力资助的教会。汲约翰从改变教会形象更有利于传播基督福音的角度出发，提倡教会实行三自。

B. 自立先驱

1. 1862 年，厦门的“闽南大会”。
2. 1873 年，陈梦南建立广州“华人宣道堂”。
3. 1881 年，席胜魔在山西邓村设立“福音堂”。
4. 1885 年，狄考文创办的“文会馆”毕业生邹立文等 40 余人，组成“山东酬恩传道会”，“以自立为主旨，以布道为事功”。
5. 1906 年，俞国桢在上海的“中国自立会”，提倡教会“自立、自奉、自传”。至 1920 年，自立会已遍及全国 16 省，多集中于浙江、福建，教堂 189 所，信徒 1 万余人。

C. 中国教会的崛起

在 20 世纪初的头 20 年，中国教会发展迅速。中国传道队伍初步形成，1919 年已有正式按立的牧师 1,065 人。中国教会领袖脱颖而出，第一代信徒子女在教会学校毕业，其中一些人到海外读神学。这些人有很好的英文水平，具备了与国际接轨的条件。例：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陈崇桂、诚静怡、王正廷、余日章、刘廷芳等。

D. 中国教会的问题意识

1. 1912 年，诚静怡撰文《中国教会的当前任务》，发表于爱丁堡大会续行委办会刊物《国际宣教评论》。他指出，中国教会正处于过渡阶段，“现

在正从‘中国差会’阶段过渡到‘中国教会’阶段……在第一阶段，所有工作都在欧洲传教士的手里是必要的。在第二阶段，东西共同努力和联合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在第三阶段，我们希望中国教会可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2. 同年6月《教务杂志》“中国教会与差会”专号，编者在社论中谈到：“差会从本质来讲是暂时的。中国教会一定会取代她的地位，担当比以往更大的工作。‘我们必须放手’是经常用来表达传教士面对快速发展的基督教在华运动的一句话……过去基督教事业的中心在差会，现在是中国教会。西方基督徒为中国工作的时代转换成中国基督徒为他们自己工作的时代已开始了。”

E. 1913年全国基督教大会

1. 1913年3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115位代表中，华人占了三分之一（对比1907年在华宣教士百年大会，经教会选派的500名与会代表无一华人）。
2. 汲约翰：“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而现在确知，中国教会有一群有才华的领袖。这样的人不必恳求我们去给予他们对教会生活的管理……会议证明其中一些中国领袖已经从外国人的会议和委员会里学到很多东西，毫无保留地提出他们的意见并进行讨论。”
3.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传道人开始从过去宣教士“助手”的身分，逐渐转变为“同事”的身分。

F. 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

1. 192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华人代表成为基督教大会的多数，而且中文与英文并列为大会的正式语言。
2. 由于代表来自各地各个基督教团体（130个宗派团体），得到广泛参与，故是次会议称为“中国基督徒在中国第一次真正的代表性集会”。

二、自立运动模式

A. 三大模式

1. 华南地区—宗派内发展自立自养教会，和差会继续保持合作关系。
2. 华北地区—联合与自立相结合。在组织上脱离，联合不同宗派华人信徒，但依然和西差会保持良好关系。
3. 华中地区—完全脱离外国教会，筑建中国人的教会，绝不受西教会管辖。

B. 具代表性的中国自立教会

1. 聚会处—以倪柝声为代表，又称“小群教会”。

2. 基督徒会堂—以王明道为代表，在北京有聚会点。
3. 真耶稣教会。
4. 耶稣家庭。

三、五年奋进运动

1. 反教高潮过后，协进会在1929年发起“五年奋进布道运动”，以期全国教会5年之内，至少能达到现有信徒质量深进、数量倍增之目的。口号：“求主奋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
2. 开展6项事工：
 - a. 改进宗教教育；
 - b. 提倡基督化家庭；
 - c. 推动识字运动；
 - d. 扩展布道事工；
 - e. 宣传受托主义；
 - f. 注重青年事工。
3. 由于各地教会领袖不能同心，再加上日本侵占东北，五运总体而言收效不大。

四、“到农村去”——乡村建设运动

1. 社会福音神学不仅关注社会服务，也为中国基督徒寻求社会重建途径，提供了理论资源。20世纪上半叶，兴起世界农业宣教运动，提倡乡村牧师不仅关心灵魂，还应成为社区领袖，而且须具备特殊技能，例：农业耕作的技术、制奶、水果栽培、农场管理、农业教育等。
2. 当时中国有3亿农民，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教会要本色化，就必须关注乡村教会建设。因此，在1923年，协进会成立了乡村教会与农民生活委员会。在教会大学和部份教会的积极推动下，经过10-20年的缓慢发展，至30年代，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达致鼎盛时期。那时，晏阳初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江西黎川有实验区。
3. 可惜，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断。

五、天主教的回应

1. 在信条和教义方面，天主教坚持其不可调和性，不愿作出让步；但另一方面，也希望避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2. 在一些方面，罗马教廷愿意尝试去适应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加华人神职的比例。1924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1925年，在北京创办辅仁大学；1926年，祝圣6位华人主教。
3. 天主教徒在华人数量迅速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增长率约9%，战后约3%。1918年，天主教徒有196万；1924年，增至224万。

第二十课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 (1937 - 1945 年)

一、唯爱与抗战

20 世纪 20 年代，鉴于对基督教在殖民大潮中扩张的反思和一战所带来的震撼，中国部份基督徒鼓吹唯爱主义。1922 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唯爱社”，同年在上海召开全国会议，宣告“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爱是胜过世界—罪恶，建设我们理想社会唯一无二的能力……所以我们绝对不参加何种战争，无论是侵掠的，或防御的。”两位著名的唯爱主义者：吴耀宗、徐宝谦。其中徐宝谦由始至终遵行唯爱路线。

二、沦陷区的教会

A. 罗马教廷的战时中立政策

1. 1939 年 3 月 14 日，教宗驻华全权代表蔡宁 (M. Zanin, 1890-1958) 在北京向全国主教发函，要求全体主教在日军占领期间，“郑重告诫属下司铎，常以明智和忍耐，埋头于神圣职务，不偏右，不偏左，即使表面上的行动也当避免……不要因个人的不明智而贻害整个团体。”
2. 1942 年，日本使节觐见教宗，递交国书。而国民政府则表示，对德、意天主教士有别于敌侨，并会保护天主教会的财产，并且派使节于次年年初到梵蒂冈觐见教宗。
3. 1944 年 8 月，经蔡宁与日本占领当局谈判，除少数人外，被关押在潍县的天主教外籍教士均获释，迁往北平各修会会院。

B. 中国东正教会的亲日策略

日本军部南进战略占上风，积极谋求北方安全，1941 年 4 月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北京东正教总会维克托尔大主教，与日军控制下的“俄侨防共委员会”关系密切，在该委员会为日军举行的集会上祈祷、演讲；每次前往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视察教务，都去拜会当地“俄侨防共委员会”负责人。

C. 日军对占领区新教的控制

1. 日本对华北占领区基督教的政策，是因应战争需要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而逐步确立起来的。
- a. 中日战争爆发初期，日军亟需“确立治安，安定人心，以保障军队后方安全”。所以，日军看重各宗教的社会服务工作，也鼓励日本宗教来华传教，并在其后提出“华北思想战指导纲要”。
- b. 随着战争持久化，日军推出《北支那宗教团体指

导要领（案）》，旨在逐步推动联合，以便控制和利用；又提出“北支那第三国系宗教团体指导要领”、“北支敌国系教会整理经营要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出台《北支敌国系教会整理经营要领》，与西方差会有关的教会被定为“敌性机关”，迫使华北基督教迅速脱离西差会，整合为超宗派的统一教团。

2. 1942 年 3 月，华北基督教联合会成立。宗旨：促进自立自养自传，凡一切经济事工不能再仰仗欧美来维持；促进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早日实现；促进完成中国化的基督教。9 月，内务总署召集教会领袖举行“第三次基督教讲习会”，目的是“筹备教团之成立，以中国本位之精神，建立中国化基督教，把一向以自立自养自传组成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进而构成统一总会与统一途径之教团，担当发扬中国之责任”。
3. 1942 年 10 月，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宗旨：“勿赖英美图存，走向自立途径，联合各宗各派，促进布道事工，自立自养自传。”教团主理是北京卫理公会会督江长川，副主理是北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周冠卿。这些国人信徒与日本人合作的理由是：挽救时艰，保全教会，争取发展空间。
4. 也有些教会领袖拒绝参加，例：王明道。他认为：“我们的教会既没有西国差会，又未曾受日方的干涉和封闭……他们一向向日方求援助，便给了日方利用的机会……政治的背景，有日方的操纵……‘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 6：14）……因信仰不同，决不参加。”

三、中国教会的沦陷经验

1. 抗日时期，教会众肢体共赴国难：
 - a. 基督教的战时救援工作，是成立各类援助和推动抗战的机构或团体。各宗派在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成立“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国难救济会”、“战时服务部”。
 - b. 协进会成立“中国基督徒公民委员会”，以唤醒信徒的公民力量为目标，扩大抗日的阵营。
 - c. 青年会成立“全国青年军人服务委员会”，并在各前线设立支部，吸收有志报国的青年到前线服务及动员。
 - d. 基督徒积极从事照顾伤兵，救济沦陷区逃来的大量难民和战争孤儿，收集捐款。
 - e. 在海外，不少教会人士大力呼吁各国，以道义的立场支持中国抗日，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
2. 如果说 20 年代的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的高涨，激发了反帝浪潮，把基督教陷于难以招架与回应的困境的话，那么因抗战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情

第廿一课 国共内战时期的教会 (1946 - 1949 年)

绪，便给予基督教一个新的机会。因为，抗战的矛头针对的是日本人，而不是“西方”的威胁。国民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敌对情绪，转化成抗日救亡。于是，针对基督教的指控，也因着环境的变化而得到舒缓。更重要的是，在全民抗日方面，中国基督徒通过种种具体的行动，见证了基督教对中国的贡献，从而在中国人心中树立了正面形象。总的来说，抗日战争为中国带来巨大影响。教堂毁于战火，牧者殉道或逃难，信徒上下在日战中本着基督爱的精神服务人群，荣耀主名。

四、抗战后期学生福音事工的发展

1. 抗战后期，学生福音事工兴旺，王明道、赵君影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2. 1945年7月，重庆南山中学礼堂举行第一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会，来自全国60间大学的40个团契，共169人参加。夏令会第四天，成立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China Inter Varsity Evangelical Christian Students Fellowship)，由赵君影出任总干事。大后方各院校分会的主日聚会有多达200人，信主人数日增。学联会当时的联络网涵盖200间大学。
3. 1947年8月，国际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简称IFES)在美国波士顿正式成立，赵君影代表学联会出席，中国加入为正式会员。稍后，赵君影兼任IFES远东区干事，包括指导菲律宾及日本的校园团契事工。同时加入IFES为正式会员的国家还有：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荷兰、挪威等共10个国家。至2003年止，共有115个国家会员。
4. 1948年，华中区举办冬令会(2月，武昌，400人)及夏令会(7月，长沙，800人)。11月，赵君影从上海往香港，自此离开大陆。1949年，战事猛烈，仍有150名学生参加冬令会。7月，于力工离开大陆。1950年8月，艾得理(D. H. Adeney, 1911-1994)离开大陆。此后，全国学联事工无以为继。

一、新教战后复员—三年奋进运动

1. 在协进会的支持中成立复员统筹委员会，提供战后工作各种消息和计划，促使“华西同工重建与收复区同工的友谊”，进而真正“归一”，协调沦陷区与国民党收复大军的互不信任。
2. 除了信徒人数增加，八年抗战使教会在物质和人才方面都蒙受巨大损失，百废待兴，亟需重建。
3. 1946年12月，协进会年会提出“三年奋进运动”，号召克服悲观情绪，带领全国信徒从1947年开始，用3年完成以下目标：
 - a. 增加信徒人数；
 - b. 加强教会力量，使教会富有生命和能力；
 - c. 再度促使教会合一与合作；
 - d. 提高社区和国民的精神生活。

二、天主教战后复员—更加中国化

1. 1945年12月，罗马教廷任命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1890-1967)为枢机，是天主教在华第一位。
2. 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 1876-1958)宣布建立中国教会圣统制，设20教省、79主教区、38监牧区，共137教区。其中，中国籍总主教3人、主教18人、监牧7人。
3. 1946年7月，设教廷驻华公使馆，任命黎培理(A. Riberi, 1897-1967)总主教为首任公使。9月，国民政府任命吴经熊为中国驻教廷公使，中梵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4. 1948年2月，在上海成立“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

三、东正教的战后复“苏”

1. 1945年，哈尔滨教区和北京总会先后重新归属“莫斯科和全俄牧首公署”；但天津教区和上海教区表示反对，仍与流亡俄罗斯东正教会保持关系。
2. 1950年在莫斯科，由莫斯科牧首和其他5位主教举行了晋升杜润臣为主教神品圣事仪式。他是东正教来华以来，第一位中国籍主教。
3. 1955年，根据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两国教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莫斯科牧首区同意中国教会取得自主地位。
4. 1956年，成立“中华东正教会”，姚福安(俄裔)任大主教，下辖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和新疆5个教区。

四、国共内战期间中国教会的应变

A. 撤退路线

1. 1948年11月，协进会召开全国会议，专门讨论应变计划的实施和宣教士的撤退问题。与会的大部份差会决定，陆续把西教士撤至香港和东南亚，使西教士从1947年的3,500人左右，减少至1949年的1,700余人。
2. 加紧培育中国籍神职人员。
3. 倾销圣经和属灵书刊。教会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制定的应变措施：
 - a. 不留钱、不留纸、大量印；
 - b. 分散运书至各地倾销；
 - c. 迁往香港。
4. 各差会的重要档案、房地产契据、有价证券，尽量转到香港存放或存入香港的银行。
5. 清查登记教会财产。

B. 适应路线

1. 以吴耀宗为首的“进步力量”，提出对基督教进行彻底改造。
2. 协进会也试图作出调整，以适应未来的全新环境，并努力探索自身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意欲通过吴耀宗与中共沟通关系。1949年6月，协进会提出中国基督教必须完善自己的7个方面：
 - a. 努力提倡教会的生产；
 - b. 努力引导有志有为青年归信基督、献身教会；
 - c. 根除教友自私自利的劣根性；
 - d. 彻底实现基督教社会主义；
 - e. 彻底铲除教会腐化分子；
 - f. 实践耶稣用行为证道的教训；
 - g. 我们在基督里作前进的人。
3. 同月，卫理公会华北教区会督江长川向政协提出5点意见：
 - a. 不求什么特殊权利，只求给予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宣教的自由。
 - b. 决以人民的立场，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以教会的人力物力，配合政府建设新中国。
 - c. 决不受任何势力利用，也不利用任何的势力，来作违反人民幸福的工作。
 - d. 决心努力合作，促成我们教会的自立、自养和自传的早日实现。
 - e. 决以正义、公道、博爱、平等、和平和敬神爱人的精神，服务人民。

C. 积极鼓励教会内外的自由主义者，树立第三势力

1.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热情只有以更高的思想和更大的热情来答复……我们必须以基督教的革新来对付共产革命，必须以基督教的共同来对付

马克思的共产……为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而努力。”——毕范宇 (F. W. Price)

2. “真正要革命而能达成民主者惟有基督教运动。理由是：基督教是形成社会主义的先声；近代神学注重社会，许多纯正社会思想家是基督徒；教会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伸冤……”——赵紫宸

D. 耶稣家庭

1. 1948年，协进会开始关注耶稣家庭，高调宣扬其共产性质，提出“基督教共产者”，想解决教会自养问题，并拉近教会与共产党革命的距离。
2. 耶稣家庭创始人敬奠瀛（1890-1957），山东泰安马庄人，1914年信主；1921年，入股成立“圣徒信用储蓄社”；1923年冬，辞去中学教师职位，“破产”传道；1924年，受神召会五旬节主义影响，与美以美会分离；1926年，参与成立蚕桑学道房，次年改称“耶稣家庭”。抗战结束时，老家信徒人口已到300人；到1949年，已达500人。1947年，他作《方舟歌》，诗曰：“耶稣家庭，宇宙精华。社会南针，人类宝筏。种族邦国，富贵贫贱都抹煞。”
3. 耶稣家庭向来看不起其他教会，将其喻作“狐洞鸟窝”。敬奠瀛主张，耶稣家庭本身就是三自的教会：“耶稣家庭真是新时代孕育出来的中国本色教会，是自治的，自养的，也是自传的，深盼她蒙受了共产主义的滋润乳养，以致发扬成长，将来可用以解放欧美一切被帝国主义所迷蒙的基督教会。”耶稣家庭俨然以教会榜样自居。1951年，敬奠瀛当选全国三自筹委会委员，回来即在讲道中表示，“以后要为众教会活”。

第廿二课

基督化家庭运动、小结与省思

一、“基督化家庭运动”

A. 缘起

1922年，在基督教全国大会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1923年，成立教会与家庭委员会。1930年1月，“五年奋进布道运动”正式起步，专设了基督化家庭委员会，发起基督化家庭运动。

B. 本来目的

基督化家庭运动共持续了20余载，内容包括婚姻、家庭教育、家庭伦理、家庭经济、家庭娱乐、家庭卫生等诸多方面。主旨始终在于推动布道、领人归信基督、在家庭生活中实践基督信仰等方面，以期能影响中国社会的变革。整体目标一直在于建立基

督化家庭，逐步以基督信仰改变国人的思维及生活方式，最终实现中国社会基督化。

C. 延伸出来的应变意义

1. 全国基督化家庭事工会议于1950年10月11-14日在上海召开。陈见真主教致题为〈教会家庭与家庭教会〉的开幕词，提出“使信徒家庭成为教会”，在新时代“将‘家庭教会，教会家庭’都联系起来，建造神在家中的教会”。提出口号：“家庭教会化，教会家庭化”。
2. “家庭教会化，教会家庭化”，明显突出了当年应对最差局面的预案，延伸出基督化家庭运动前所未有的应变意义。随着50年代三自爱国运动逐步深入，中国教会在日益强化的政治压力之下，除主动或被动加入三自爱国会阵营之外，家庭教会化成为虽冒风险、但仍不失为可行的一种选择。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连三自爱国会也被迫解体。家庭中的教会，成为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
3. 这本意是临时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应变思路，长久地形塑了中国教会的想像力，并影响其发展方向直到如今。

二、罗马教廷的应变

1. 从1948年开始，罗马教廷就积极布置应变和撤退的措施，派两位美国枢机专程到华负责策划。同年，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飞往梵蒂冈请示。1949年2月，教廷指示：大修院生迁往安全地带，继续学业；小修院生，教宗谓全部迁移或无可能。除少数特殊危险者可避走外，其他圣职人员得留守其岗位。
2. 1949年之前，外籍神职人员有5,507名，建国时仍有2,229名坚守岗位，其中包括驻南京的教廷公使黎培理(A. Riberi, 1897-1967)总主教。
3. 1949年6月30日，教廷圣职部发布反共产主义法令：
 - a. 不可报名加入共产党或袒护共产党，因为共产主义是唯物的，反对基督信仰的。虽然共产党的领袖有时以言论表示自己不反对宗教，但事实上，不论在理论或行动方面，都显示他们反对天主，反对真宗教，反对基督的教会。
 - b. 依据法典第1399条，禁止出版、传播或阅读袒护共产学说或共产行动的书籍、定期刊物、日报或活页传单，或在刊物上投稿。
 - c. 教友若明知而故意参与上述活动，不准领圣事。
 - d. 若教友承认共产党的唯物主义及反基督的邪说，甚至为这些邪说辩护、宣传，将立即被视为背弃公教信仰，并遭受宗座特别保留的绝罚—被赶出

教会。

三、1949年中国教会总体实力

A. 信徒人数

1. 天主教—327万
2. 基督教—90-100万
3. 东正教—30万

B. 神职人员数目

1. 天主教—14,358
2. 基督教—22,964
3. 东正教—300

C. 教堂数目

1. 天主教—25,000
2. 基督教—7,000
3. 东正教—300

四、近代教会沉思录

1. 评估中国人是怎么理解福音的？
2. 评估中国人是怎么看基督徒的？
3. 教会是否应该提及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
4. 什么是教会该坚持的？什么是可以放下的？
5. 教会是否应该努力进入主流社会？
6. 如何评价天主教和新教颇为不同的宣教策略？

五、194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教会

A. 从观望思考到自我改变

自1949年后，教会、机构、学校、医院等都经历了从观望思考、表面形式上的改革，到心灵深处的革命。不论是有意或无意的，顺从还是抗命的，其结果早晚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普遍共识，是自我改变。于是，大家纷纷努力在各个方面去适应新时代。

B. 例：燕京大学应对时局之法

1. 自1948年12月北平被围困以来，学生分成40组，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及中共的《土地法》，以“认识新时代”为主题，充分讨论当前局势及其发展。同时，教职员也组成4个研究会，研究时事和新民主教育制度等问题。
2.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部和平撤出北平。31日，共产党军队进入北平。当时，燕大尚有500-600学生。
3. 改革似乎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教授大谈“改革学制”；学生则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边疆舞、秧歌舞代替西洋舞。女生不再涂脂抹粉，

只穿蓝布大褂；男生不再见公子哥的样子。大家都愿意参加一些体力劳动。

4. 学校中的基督徒团契仍在活动，并时常与清华大学学生公社互相往来交通，彼此鼓励。
5. 8月，燕大宗教学院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增加了《基督教与马列主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从未开设的课程。
6. 12月，燕大团契组织了一个“宗教生活学习组”，有20余人参加，目的是有计划和组织地研究及探讨问题。当时，他们讨论了两个问题：
 - a. 劳动创造世界与神创造世界；
 - b. 阶级观点—什么是神的爱？

第廿三课 以史为鉴看今日中国教会

一、中国社会面貌的变化

1. 城市化。
2. 老年化。
3. 阶级化。
4. 多元化。
5. 网络化。

二、中国教会的现况与问题

1. 乡镇教会的萎缩。
2. 城市教会兴起。
3. 信徒迁移及流动。
4. 工人缺少及训练不足。
5. 教会体制未健全。
6. 民间信仰化。
7. 真理教导待加强。
8. 异端的搅扰。
9. 年龄老化。
10. 信徒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11. 姐妹居多。
12. 教会与信徒边缘化。
13. 其他。

三、以史为鉴反思今时

1. 教会的核心是什么？什么该坚持？什么可放下？
2. 教会首要的使命是什么？要为什么事情发声？
3. 教会与社会该如何互动？是否该努力进入主流社会？
4. 教会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对社会的定位是什么？应负起什么社会责任？
5. 教会如何面对文化、社会风潮、异端的冲击？

6. 教会如何教导并坚固信徒，把真理活化于生活之中？

第廿四课 中国教会的发展前景

一、教会的牧养教导

1. 不同地区不同模式—城市与乡镇。
2. 分龄分工牧养。
3. 不同群体牧养。
4. 牧养模式多元化。
5. 点片制、巡回牧养和定点牧养。
6. 基督教教育开展—儿童、青少年、成人、长者、特别群组（例：姊妹、弟兄等）。

二、教会组织的建立

1. 行政架构、制度—执事会、同工会。
2. 全职、专职同工训练及建立—义工团队转型。
3. 团队事奉、分工配搭—不再一言堂。
4. 事奉人员的训练及组织。

三、教会福音事工的发展

1. 城市宣教。
2. 职场宣教。
3. 老年事工延展。
4. 散居之民事工—民工、漂族……
5. 特定群体事工—残疾、单身、老年、少数民族……
6. 社会事工—医疗、教育、扶贫、出版、文化……

四、展望教会健康成长

1. 本土差传。
2. 神学教育的发展。
3. 视野拓展—国际化。
4. 扩大资源及应用。